

Chinese Word Geography—A Case Study of *Fanshu* “Sweet Potato”

Zhijia Ni, Mengbing X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Email: rgnzhj@163.com, xiangmb@pku.edu.cn

Received: Jan. 21st, 2014; revised: Feb. 10th, 2014; accepted: Feb. 20th, 2014

Copyright © 2014 Zhijia Ni, Mengbing Xiang.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 accordance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all Copyrights © 2014 are reserved for Hans and the owner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Zhijia Ni, Mengbing Xiang. All Copyright © 2014 are guarded by law and by Hans as a guardi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ap 015 in the vocabulary volume of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LACD), this paper reclassifies the word forms of *fanshu* “sweet potato” at 930 Chinese dialects into 6 broad categories (“*shu*”, “*yu*”, “*digua*”, “*shanyao*”, “*luobo*”, “*ge*”) and 47 sub-categori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certain original characters and dialect materials. Then we draw necessary interpretive maps and discuss several related issues with these map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the words *shao* and *hui* which refer to the sweet potato is *shu*. 2) In all the 930 dialects, the “*shu*” category, as the dominant one, is used in 729 dialects (78%),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which are *fanshu* and *hongshu*. 3) Dialect contact tends to result in the blend of word forms. For example, the contact of *fanshu* and *shanyu* results in *fanyu* and *shanshu*, while *hongyu* is also a blend word due to the contact of *shanyu* and *hongshu*. 4) Immigrants as well as important traffic lin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ialect diffusion. For example, immigran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brought sweet potatoes and their name “*digua*” to the northeast China, while the “*yu*” category in the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Shanghai City and Anhui Province diffused northward along the Grand Canal till the starting point Tong County (which is called Tongzhou District nowadays). 5) To simply analyz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doesn’t guarantee us a right answer. For instance, the ABA pattern can result from either the innovation of the central area, or other factors such as parallel evolution, jumping diffusion over a long distance, etc. It’s hard to know wha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he ABA pattern contains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related documents. 6) Since the scientific name of sweet potato “*ganshu*” doesn’t have a dialectal foundation and is identical with “*ganshu*” which refers to a kind of yam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it is appreciated that the botany academia takes “*fanshu*” as the scientific name.

Keywords: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Fanshu* “Sweet Potato”; Classification of Word Forms; Interpretive Maps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倪志佳, 项梦冰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Email: rgnzhj@163.com, xiangmb@pku.edu.cn

收稿日期: 2014年1月21日; 修回日期: 2014年2月10日; 录用日期: 2014年2月20日

摘要: 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LACD)词汇卷015图为依据, 在梳理本字和若干方言语料的基础上, 把930个汉语方言点番薯说法的词形重新分为6大类(“薯”类、“芋”类、“地瓜”类、“山药”类、“萝卜”类、“葛”类)47小类, 绘制出必要的解释性地图, 并结合地图讨论若干相关问题。主要

的结论有：1) 指称番薯的“苕”和“苕”本字都是“薯”；2) “薯”类词形是优势词形，拥有 930 个方言点中的 729 个(78%)，而“番薯”和“红薯”又在“薯”类词形中占压倒性多数；3) 方言接触往往导致词形的混合，例如“番薯”和“山芋”的接触产生了“番芋”和“山薯”，“山芋”和“红薯”的接触产生了“红芋”；4) 移民和重要的交通线在方言扩散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例如山东移民把番薯及番薯的称谓“地瓜”带到了东北，苏沪皖一带的“芋”类词形沿着大运河向北扩散，一直到大运河的起点通县(今通州区)；5) 单纯对词形的地理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不一定能把我们引入真理之门，例如 ABA 分布既可肇因于中心区的创新，也可由平行演变、跳跃式远距离扩散等其他因素导致，如果不结合文献，很难知道 ABA 分布蕴含着何种历史信息；6) 番薯的学名“甘薯”不具有方言基础，又跟古文献中指称薯蓣的“甘藷”(甘藷)重名，植物学界以“番薯”作为学名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关键词：汉语方言地图集；番薯；词形分类；解释性地图

1. 引言

1.1. 本文的宗旨及约定

番薯(英文名 sweet potato, 拉丁名 *Ipomoea batatas* Lam.), 为旋花科(convolvulaceae)一年生或多年生蔓生草本植物，是一种丰产而又易于栽培的重要粮食作物，北京小吃烤白薯烤的就是这种东西。番薯在汉语方言里颇有一些不同的叫法，如“红薯”、“白薯”、“红苕”、“山芋”、“地瓜”、“山药”等。《汉语方言地图集》^[1]词汇卷 015 图“红薯”(下文简称 LV015)描写了 930 个汉语方言点的番薯词形及其地理分布，本文拟在 LV015 的基础上进一步绘制解释性地图，并讨论若干相关的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2]以“甘薯”作为番薯的学名，“白薯”和“红薯”作为番薯的通称，“番薯”则视为方言词。《中国植物志》^[3]、《简明生物学词典》^[4]、《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5]等都以“番薯”作为学名。除了引文，本文一律称“番薯”。

“薯”字本作“藷”或“藷”等，详见 3.1 的讨论，本文一律写作“薯”，但引文悉遵原作。引用的古籍随文交代版本，不列入参考文献。

铃木史己(2009)^[6]曾以“薯类：马铃薯和甘薯”为题，进行过汉语方言马铃薯和甘薯的词形分类，绘制了 4 幅方言地图(马铃薯和甘薯的综合地图各 1 幅，马铃薯“洋”类的分布图 1 幅，“山药”的所指图 1 幅)，并对地图做了简略的讨论。铃木的研究并非以《汉语方言地图集》为基础，而且本文对词形的分类在做法上跟铃木有很大的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也基本不重叠。因此，除了必要时加以引用外，我们对铃木的研究不

做介绍和评论，请读者自行参看。

本文所使用的方言语料都随文交代出处，凡未交代出处的都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5)^[7]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8)^[8]。本文对标调法做了统一。

1.2. 早期文献中的“甘藷”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藷”条曾引《异物志》和《南方草物状》的有关描写，转引如下(据四库全书本)：

《异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为米谷。

《南方草物状》曰：甘藷，二月种，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经久得风乃淡泊。

对于《异物志》和《南方草物状》这两本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而这两本书里所记的“甘藷”指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也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异物志》为东汉杨孚所撰，时间在公元 100 年前后；《南方草物状》(亦名《南方草木状》，但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并非一书)为西晋嵇含所撰，时间约在公元 300 年前后。至于两书所记的“甘藷”，多数学者都认为跟今天的番薯没有关系(参见丁颖 1928^[9]；丁颖、戚经文 1948^[10]；吴德邻 1958^[11]；胡锡文 1958^[12]；吴德铎 1960^[13]、1961^[14]；夏鼐 1961^[15]；项梦冰 2014^[16])，是同名而异实；番薯乃是明代从国外传入的物种，只不过袭用了“甘藷”之名而已。《异物志》和《南方草物状》所记的实际

上是薯蓣科(Dioscoreaceae)里的甜薯(一说参薯),即 *Dioscorea esculenta* Burk.。

1.3. 番薯的引入及传播

一般认为,番薯原产美洲,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被引入欧洲,16世纪上半叶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然后再由此传到亚洲大陆各国。番薯传入中国并非一时一地的单发性事件(sporadic event),而是异时异地的多发性事件(multiple events),这一点经过学术界的多年研究已无疑义。表1即我们归纳的若干此类事件(根据陈树平 1980^[17],梁家勉、戚经文 1980^[18],杨宝霖 1982^[19],公宗鉴 1991^[20]):

此外,何炳棣(1978/1979)^[21]根据嘉靖《大理府志》、万历《云南通志》的物产记载推断,明嘉靖年间或更早番薯已由印度、缅甸传入云南。陈树平(1980)^[17]亦根据万历《云南通志》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已有种植“红薯”的记载推断云南传入番薯比福建早了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了八九年。值得注意的是,西南陆路说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事实上,仅仅根据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的物产记载并不能明确得出云南在当时已经种植番薯的结论。杨宝霖(1982)^[19]已指出万历《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并非番薯,曹树基(1988)^[22]、韩茂莉(2012)^[23]亦持相同意见,并有进一步阐发。可见西南

陆路说目前并无实据,可以弃而不从。

从表1可见,就时间而言,番薯的引进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具体来说是16世纪后期;就引入地而言,番薯最先引入的是福建和广东两省;就薯种来源地而言,主要是安南(今越南)和吕宋(今菲律宾)。以上所列的事件中,尤以陈振龙的引种影响最大,《金薯传习录》(卷上)载之甚详,可参看。而洪武年间番薯传入晋江的说法如果属实,则Yen(1974)^[24]所设想的在欧洲人航行到太平洋之前,番薯已经从起源地南美传播到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东部、中部以及美拉尼西亚(Melanesia)东部的Kumara路线(大概不晚于公元400-700年)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证据¹。因为苏禄群岛就在美拉尼西亚的西面,洪武年间引入晋江的苏乐国(即苏禄国)薯种自然应当是Kumara路线向西播迁的结果。

番薯引入中国之后,因其高产、耐旱、容易栽种等优点,首先在福建、广东两省迅速传播,不久又传入台湾²。稍后,邻近的闽、粤两省的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等省份在清初陆续开始种植番薯。随后,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陕西等省份,西南的四川、贵州等省份,在乾隆初期也逐渐引种番薯。

番薯的传播既有民间力量的推动,如闽粤客民在南方山区的广泛开发,又如陈振龙父子及其几代子孙的大力宣传和亲身实践(参见《金薯传习录》卷上);

Table 1. The time and rout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sweet potatoes into China
表 1. 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及路线

时 间	引种人	引种地点	记载文献
明洪武二十年(1387)	苏得道	苏乐国→福建晋江	乾隆《南宗谱》、民国《朱里曾氏房谱》
不详	林怀兰	交趾→广东电白	光绪《电白县志》
万历十年(1582)	陈 益	安南→广东东莞	同治《凤冈陈氏族谱》
万历十二~十三年(1584~1585)	洋 船	南澳(漳、潮之交)→福建晋江	清·龚显曾《亦园脞牍》引苏琰《朱菡疏》
万历二十一年(1593)	陈振龙	吕宋→福建长乐	清·陈世元(辑)《金薯传习录》

¹ 我们未睹Yen(1974)原书,这里的介绍根据的是Hays(1979)^[25]和罗文彬(2006)^[26]。张箭(2012)^[27]也曾有过如下介绍:“1769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随行植物学家布恩克斯和索兰德在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岛发现当地土著居民栽种吃食甘薯。在那一带的库克群岛上发现的甘薯(块根)古遗物经放射性碳测年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人们认为甘薯传到玻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可能在公元700年。并猜测很可能是玻利尼西亚人航行到南美带回了甘薯,又把它传播到夏威夷和新西兰。因为玻利尼西亚人的航海传统和水平都比南美印第安人悠久和高超得多。甘薯作为从南美洲返航的筏子上的储粮之一传入了大洋洲。这种筏子曾由一个叫孔提基-威斯的西方人驾乘从南美向西漂流渡过了东太平洋到达了大洋洲的玻利尼西亚等群岛。这就为库克和哥伦布等到达该地以前甘薯已分布于太平洋各群岛提供了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Dixon(1932)^[28]对玻利尼西亚的番薯问题已有很好的讨论,曾指出:“the similarity of name for the plant in Polynesian and Kechua speech is a striking fact.”(“这种植物的名称在波利尼西亚语和南美奇楚亚语里的相似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译按:番薯在波利尼西亚语里叫kumara,与秘鲁奇楚亚语里的某个番薯品种的名称kumar惊人相似。)

² 陈树平(1980)^[17]已指出:“台湾明时为福建一个府,清朝建立后,到康熙二十二年始置于清朝管辖之下。台湾番薯的来源,既有康熙二十二年后闽粤移民带去的,也有直接来自南洋的。《诸罗县志》:‘番薯,……种自南夷(即指南洋),生熟皆可食。……又有文来薯,皮白肉黄而松,云种自文来国(位于加里曼丹北端)’(康熙五十六年[1717]《诸罗县志》卷十)。”

也与一些学者和官员,乃至清政府的积极倡导密不可分,例如晚明何乔远曾作《蕃薯颂》赞美番薯,徐光启则写有《甘薯疏》详言番薯之利和种薯之法,并亲身实践将薯种由福建引入松江地区,又如乾隆时期的陕西巡抚陈宏谋、直隶总督方观承、山东布政使李渭、山东按察使陆耀等都曾在所任地区内劝谕民众种薯,直接推动了该地区番薯的传播(参见郭松义 1986)^[29]。作为最高统治者,乾隆也曾两下谕旨³,劝种番薯,从而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种植番薯的高潮。到乾隆末期,“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及东北三省未见有关番薯记载之外,其他各省都已种植”(陈树平 1980)

^[17]。嘉庆以后,番薯在各地深入推广。至清末,甘肃及东北地区也已经引种番薯(参见宋军令 2007)^[30]。

2. LV015 的词形分类

LV015 图把 930 个汉语方言点番薯的说法归纳为 5 大类 55 小类,本文转写为表 2。

A 类有 21 个小类,626 个方言点,所用的符号是黑色的;B 类有 9 个小类,94 个方言点,所用的符号是红色的;C 类有 14 个小类,111 个方言点,所用的符号是蓝色的;D 类有 6 个小类,83 个方言点,所用的符号是绿色的;E 类有 5 个小类,16 个方言点,所

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fanshu*'s word forms on Map 015 of LACD vocabulary volume
表 2. LV015 的番薯词形分类

	A 类(黑色) ⁶²⁶	B 类(红色) ⁹⁴	C 类(蓝色) ¹¹¹	D 类(绿色) ⁸³	E 类(黄色) ¹⁶
1	红薯 [210]	红苕 [52]	红芋 [17]	地瓜 [56]	苕 [6]
2	红薯~番薯 [3]	红苕~红薯 [3]	红芋~白芋 [2]	地瓜~红薯 [3]	粉葛 [1]
3	赤薯 [2]	红苕~苕 [3]	红芋~山芋 [3]	地瓜~芋头 [1]	甘萝卜 [1]
4	黄薯 [3]	红苕~番苕 [2]	白芋 [2]	山药 [21]	山萝卜 [2]
5	白薯 [16]	红苕~红芋 [2]	白芋~山芋 [1]	山药~甘薯 [1]	其他 [6]
6	甘薯 [2]	番苕 [2]	花芋 [2]	白山药 [1]	
7	甜薯 [2]	苕 [22]	山芋 [50]		
8	糖薯 [1]	苕~红薯 [7]	山芋~番芋 [1]		
9	番薯 [316]	苕~番薯 [1]	山芋~芋头 [1]		
10	胡薯 [1]		山芋~地瓜 [2]		
11	京薯 [3]		番芋 [22]		
12	根薯 [2]		饭芋 [1]		
13	花薯 [1]		沙芋 [1]		
14	萝卜薯 [1]		芋头 [6]		
15	山薯 [9]				
16	老薯 [1]				
17	薯 [32]				
18	薯一 [14]				
19	薯薯 [3]				
20	薯棒 [3]				
21	薯脑壳 [1]				

³乾隆五十年(1785)八月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前一谕旨的全文为:“谕军机大臣等。据明兴奏:陆耀于山东臬司任内,曾刻有《甘薯录》一编,颇为明切易晓。现饬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等语。所办甚好。河南频岁不登,小民艰食。前已谕令毕沅:转饬各府州县,仿照怀庆府属广种薯蕷。即直省迤南各府,今年亦因雨泽愆期,收成歉薄。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且东省各府既间有种植,自不难于就近购采。朕阅陆耀所著《甘薯录》,颇为详晰。著即钞录寄交刘峨、毕沅,令其照明兴所办,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清实录》卷之一千二百三十六,据中华书局影印本)

用的符号是黄色的。表2 每个小类都用直方括号标出方言点数，但没有提供原图图例中所使用的各种彩色符号。每个大类和小类的方言点数都是本文作者手工点算的，容或有个别误差，但不会影响本文的总体结论。

LV015 通过颜色和符号形状的搭配，每个小类在地图上的代表符号都是唯一的。例如黑色的●代表“薯”，绿色的●代表“地瓜”，红色的▲代表“苕”，蓝色的▲代表“山芋”。详细的情形请查看 LV015 原图。

LV015 词目“红薯”(Sweet Potato)原有一个注：“薯：部分地点读阳平，符合‘薯’。薯：《广韵》鱼韵署鱼切，似薯蕷而大。”今按：《广韵》平声鱼韵署鱼切所收为“薯”字而非“薯”字，参见下文 3.1.1.1。

3. 番薯词形的重分类

3.1. 本字及词形的若干说明

3.1.1. 关于“薯”字

“薯”是后起字，《说文》未收。按目前掌握的材料，它始见《玉篇》，是一个典型的形声字(从艸署声)。《广韵》去声御韵常恕切：“薯，薯蕷。又音诸。薯：薯蕷。俗。”即“薯蕷”是“薯蕷”的俗写。又平声鱼韵署鱼切：“薯，似薯蕷而大。或作‘稭’。”而“薯”跟“薯”实际上也是异体关系，因为《广韵》去声御韵常恕切“薯”字说明“又音诸”，可是平声鱼韵章鱼切收的却是“薯”(薯蕷别名)而不是“薯”。

按照中古的字书(《玉篇》、《类篇》)及韵书(《广韵》、《集韵》)所载，“薯”兼有平声(署鱼切、章鱼切、陈如切*)和去声(常恕切)的读法(以《广韵》的反切为准，《广韵》未收的据《集韵》，后加星号以示区别)，“薯”则只有去声的读法(常恕切)，其中署鱼切、陈如切*都可用作单音词，常恕切则见于双音词“薯蕷”(或作“薯蕷”等)。《山海经》(据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卷三“北山经”云：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蕷(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单呼为薯，音储，语有轻重耳)，其草多秦椒，其阴多褚，其阳多玉。

括号内的字是东晋郭璞所加的注。可见，在东晋

时，江南单称薯蕷为“薯”(音“储”，平声)，与双音词“薯蕷”的“薯”读去声(“曙豫”)不同。《广韵》所收的两个平声读音，署鱼切可以看作“储”音的一种变化，而章鱼切则可能是因同形字“薯”(音诸，《说文》“薯蔗也”)的影响所致。

从中古以后文献“薯”字的使用情况看，以去声的地位(常恕切)见于双音词“薯蕷”这一限制早已被打破，例如：

薯蕷《本草》名著薯蕷，汀人呼薯。有红白二种，其白者又呼山药、雪薯。(乾隆修、同治六年[1867]刊《汀州府志》卷之八“物产”)

……蕷、芋、薯、茄……(康熙五年[1666]《连城县志》卷四“籍产志·物产”)

长汀、连城都属于薯蕷“单呼为‘薯’”的地区，但地方志的物产部分早已通用“薯”字，其音韵地位为禅母鱼韵平声，如长汀今叫[ɕfuɿ] (据曹培基 1997^[31])、连城今叫[ɕfiɛɿ] (据本文第二作者的田野调查)。可见现代汉语用“薯”字兼记平声和去声的来源是合适的。换言之，“薯、薯、薯”可以不论平声去声一律视为异体字。

“薯”字章鱼切、陈如切的读法目前都尚未在汉语方言里发现⁴。署鱼切的读法主要通行于南部，如温州[ɕzeiɿ]、梅县[ɕsuɿ]、广州[ɕfyɿ]、福州[ɕsyɿ]。常恕切的读法不算常见，主要是一些中部地区的方言，而且常常是平声读法和去声读法并存，如苏州[zuɿ²ɿ/zɿ²ɿ]、长沙[ɕɕyɿ/ɕyɿ²ɿ]、双峰[ɕdyɿ/dyɿ²ɿ]。大部分官话“薯”字读上声，如北京[ɕsuɿ]、西安[ɕfuɿ]、武汉[ɕɕyɿ]、扬州[ɕsuɿ]，属于例外读音，它们通常也不用于薯蕷义，例如北京薯蕷叫“山药”[ʃanɿ iauɿ] (据陈章太、李行健 1996^[32])，“薯”字用于“白薯”[paiɿ ʃuɿ]等词。可惜 LV015 没有提供语音词形，本文无法就“薯”字各种读音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考察。

官话“薯”字读音不合规律可能跟“薯蕷”的避讳改词有关。宋寇宗奭《本草衍义》(据续修四库全书

⁴ 有一些方言，例如双峰话，“薯”读[ɕdy]，似乎可以看作是来自直余切，可是双峰话古禅母字本来就有一部分今读d-，例如“臣”[ɕdien]、“城”[ɕdien]、“常”[ɕdɔŋ]等。从方言比较的立场看，双峰话的“薯”读[ɕdy]还是看作来自署鱼切比较妥当(例如“薯”的若干方言读音：长沙[ɕɕy]；合肥[ɕtʂ^hu]；福州[ɕsy]、厦门[ɕtsu]、潮州[ɕtsɿ])，即[ɕdy]乃是*dz_u一类形式的演变结果。

本)卷七“山药”条说:

按《本草》，上一字犯英庙讳，下一字曰“蕷”，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为“药”，今人遂呼为“山药”。如此则尽失当日本名，虑岁久以山药为别物，故书之。

即“山药”说法的兴起导致“薯”字的停用，等到明清之际再从南方传入番薯时，可能受形近字“暑”的影响而读成了上声(项梦冰 2014^[16]对“薯”字的形音义及“薯蕷”的犯讳改词有更多的讨论，请参看)。事实上把“薯”错写成“薯”字的人并非个别，可以说明字形和字音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是“搜狐网友 26233394”博文《“薯片”的“薯”》中的一段(因网址长达五六行本文恕不提供):

...刚才告诉丁丁我想吃零食了，便打算例举出一些我喜欢的零食让丁丁去买，可惜的是我不会写“薯”，用 potato chips 代替，丁丁看后说暑假的薯你会写吧？加个草字头就好。可现在我又突然发现，丁丁的说法是错的...今天的收获是：我记住了“薯片”的“薯”不是草字头加上“暑假”的“暑”。

3.1.2. 关于“苕”字

根据表 2，B 类词形为“苕”或以“苕”为词根的复合词(如“红苕”、“番苕”等)，共有 94 个方言点。《说文解字·艸部》“苕，艸也。从艸，召声。”《广韵》平声萧韵徒聊切(今读 tiáo)， “苕菜。诗云：‘邛有旨苕’。”《汉语大字典》^[33]五 3198 在这个读音下共立 5 个义项：①凌霄花；②苕菜(紫云英)；③芦苇的花穗；④水名，苕溪的简称；⑤姓。诗经“邛有旨苕”的“苕”即指凌霄花。《汉语大字典》五 3198 “苕”又立 sháo 一读，有两个义项：①方言。甘薯又称“红苕”。②方言。傻里傻气，如：你莫苕。即 sháo 是为现代方言立的，两个义项都没有提供文献资料。很显然，“苕”sháo 跟“苕”tiáo 音义都不存在关联，只能视为同形字。关于“苕”sháo 的词源，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下面分别介绍。

(一)“苕”sháo 可能来自“山药”的合音。石声汉(1958/2009)^[34]指出:

目前，长江上中游几省，都有将山药及 *Ipomoea* 叫“韶”的地区。是否“山药”两字拼合而成为 s_hok，

再转变成 s_{ou}，以至成 s_{au}是可以考虑的。

(二)“苕”sháo 即“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菜部·菜之二”之“薯蕷”条引宋·苏颂(1020-1101)《本草图经》(1061 年)说:

颂曰：江、闽人单呼为藟(音若殊及韶)，亦曰山藟。《山海经》云：景山北望少泽，其草多藟蕷(音同薯蕷)。则是一种，但字或音殊或音诸不一。或语有轻重，或相传之讹耳。

按：《本草图经》已佚，《本草纲目》所引跟前人所引有文字上的出入，例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1249 年，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影印张氏原刻晦明轩本)卷六“草部·上品之上”之“薯预”条:

《图经》曰：...又江、湖、闽中出一种，根如姜芋之类而皮紫，极大者，一枚可重斤余...彼土人单呼为藟(音若殊)，亦曰山藟。而《山海经》云：景山北望少泽，其草多藟蕷(音与薯预同)。郭璞注云：根似芋，可食。今江南人单呼藟(音储)，语或有轻重耳。据此注，则薯蕷与藟乃一种，南北之产或有不同，故其形类差别。然字音殊、储不同，盖相传之讹也。一名山芋。

早出的《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108 年，据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尚志均点校本)卷第六“草部·上品之上”之“薯预”条所引跟《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是一样的。很明显，《本草纲目》所引《本草图经》的有关内容是经过李时珍的改动和缩写的。特别重要的改动有两项：一是把“江、湖、闽”改为“江、闽”，一是把“音若殊”改为“音若殊及韶”。这两项改动大概是基于李时珍自己对单音词“藟”的地理分布及读音的了解。

清代亦有学者认为“苕”即“薯”。道光二十一年(1841)《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之“甘藟”条引郑珍(1806~1864)《田居蚕室录》(已佚)说：“俗呼‘韶’，‘薯’声之转。有红、白二种。”

“苕”来自“山药”合音的设想显然是不足为训的。首先跟文献的描述不符。《本草图经》对《山海经》有关薯蕷的记载(引文见前文 3.1.1)特别评论说“薯蕷与藟乃一种”，“南北之产或有不同”，“字音殊、

储不同，盖相传之讹也”。李时珍将《本草图经》的读音说明改为“音若殊及韶”，针对的仍是江、闽的单音词“薯”。既然江、闽薯蕷本不呼“山药”，而是通行单音词“薯”，合音的设想就失去了基础。更何况从语音上看，江、闽在明代大概都属于有入声的范围（这一范围里的方言今天绝大部分也仍然保留入声），“山药”若果真发生合音，其结果也应当是*ʂo(k/?)或*fio(k/?)一类的入声字。

根据 LV015, B 类词形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参看下文 4.3.3. 2)图 6), 优势词形为“红苕”。这一地区主要通行没有入声的西南官话。古入声字在这些方言里今读主要归阳平, “山药”合音为 sháo 似乎不存在塞音韵尾和调类方面的障碍, 可是韵母上仍然还是不能说通, 以武汉、成都、毕节为例(毕节据明生荣 2007^[35])。武汉番薯叫“苕”[sau˨˩], 成都番薯叫“红苕”[xoŋ˨˩ sau˨˩], 毕节番薯叫“红/白苕”[xoŋ˨˩/pai˨˩ sau˨˩], “药”字分别读 [io˨˩ yo˨˩ io˨˩], 显而易见, 三地“苕”和“药”的韵基都不相同。实际上, 药韵读 -au 是北京那一路官话的特点, 除了较新的外来层次, 西南官话药韵字照例不读 -au。下面再看宜昌方言的有关词汇(据刘兴策 1994^[36]):

红苕 xoŋ˨˩ sau˨˩
 红薯 xoŋ˨˩ su˨˩
 苕 sau˨˩
 山药 san˨˩ io˨˩

即宜昌番薯有“红苕”、“红薯”、“苕”三种说法, 其中“红薯”大概是受通语影响产生的, 而“红苕”则是“苕”加上修饰成分的结果。宜昌薯蕷仍叫“山药”, 没有发生合音, 而且即使合音, 其结果也应为[so˨˩]或[çio˨˩]。

我们认为, 李时珍和郑珍对于“薯”(薯)字读音的意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苕”的本字其实就是“薯”(薯), 只是由于韵母特殊, 读音和字形逐渐脱离了联系, 以致人们又新造了一个形声俗字“苕”。“苕”字的词源之所以变得模糊, 主要原因是 -au 在相关方言里是鱼韵字今读的孤例。其实孤例不应成为本字考证的绝对障碍, 如建瓯方言“去”字读[kʰɔ˨˩], -ɔ 也是鱼韵字里的孤例,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本字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 LV015 图仍有两个徽语使用 B 类词形, 即

黟县与淳安, 似乎可以看作江、闽人“音若殊及韶”的残迹。以黟县为例(据谢留文、沈明 2008^[37]):

番苕 fo˨˩ sau˨˩ 白薯
 山芋 so˨˩ yei˨˩
 百号 pa˨˩ xɿ˨˩
 红心番苕 xɿŋ˨˩ sei˨˩ fo˨˩ sau˨˩
 白心番苕 pʰa˨˩ sei˨˩ fo˨˩ sau˨˩
 黄心番苕 oŋ˨˩ sei˨˩ fo˨˩ sau˨˩

即黟县番薯叫“番苕”, 也叫“山芋”或“百号”⁵。单音词“薯”(即薯)原来指的是本土物产, 而番薯是外来物种, 所以加上“番”字, “番苕”就是“番薯”。

“薯”音若“韶”的方言有可能存在层次问题, 即“薯”还可以有另外的读音, 例如黟县“马铃薯”[mo˨˩ le˨˩ su˨˩], 其中的“薯”字读[çsu˨˩]不读[çsau˨˩]。又如上引的宜昌方言, “薯”字也有[çsau˨˩ ˘su˨˩]两音。当然, 目前我们对于“薯”字音若“韶”的性质还不是十分清楚: 是鱼虞有别的残迹还是个别口语用字的特殊创新? 不同方言之间是否存在借用的现象? 如果存在借用, 扩散的方向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还需指出的是, “苕”在文献里还有其他一些写法。例如:

薯蕷。《识略》云: 兴义府平地处长种红薯。按: 薯蕷郡产甚多, 俗呼为红烧, 又谓之山芋……今考薯蕷、山药本是二物。山药细而长, 皮肉皆白, 味淡; 薯蕷形稍短, 味甘, 而皮有黄白二种, 故俗有红烧之名。郡之贫民, 多用以代饭。(咸丰四年[1854]《兴义府志》卷四十三“物产志·土产·蔬属”)

红藕, 一名薯。蔓引于地, 茎微赤, 叶似山药, 状如萝卜, 红色。(嘉庆十八年[1813]《汉南续修府志》卷二十二“物产”)

红藕, 山间亦种以助粮, 然随挖随食, 邑侯陈公名仅, 刻《艺藕集证》劝以广种储荒, 其法甚备。(道光二十三年[1843]《紫阳县志》卷三“食货志·树艺”)

《兴义府志》所说的“红烧”指的大概是番薯, “烧”即“苕”, 应为记音字, 为什么读成了阴平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参看下文 4.3.3. 2))。《汉南续修府志》⁵“百号”原有同音字记号, 其实就是本字, 当为番薯品种名称“胜利百号”(也叫“冲绳百号”)的简称。

《紫阳县志》所说的“藉”即番薯。查新编《紫阳县志·方言志》^[38]，番薯叫“苕”[ɕsau-]，读音并无特别之处。《兴义府志》对“红烧”的解说殊不可解，“皮有黄白”与“俗有红烧之名”有何关联？大概是编者参考了“红苕”的命名理据，但却没有消化。例如：

番薯，赤白二种，邑人谓之红苕、白苕。（道光十三年[1833]《石泉县志》卷之三“食货·物产”）

“红苕”、“白苕”本是按颜色所做的分类，一旦成为通称，就不再局限于颜色。兴义的“红苕”既为黄白二种，自然无法从颜色寻求其造词理据了。

3.1.3. 关于 C12 “饭芋”、C13 “沙芋”

C12 只涉及一个方言点，即安徽的绩溪。按照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39]和赵日新(2003)^[40]所记，番薯绩溪叫“饭芋”[fɔ²-ɿ y²-ɿ/fɔ²-ɿ y²-ɿ]。就绩溪方言自身而论，“饭芋”两字的读音都完全符合语音演变规律，并无疑义。不过我们认为绩溪[fɔ²-ɿ y²-ɿ]的本字其实就是“番芋”，而“饭芋”大概是因“番”字的读音发生讹变后所自然产生的一种俗词源(popular etymology)。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贵阳方言。LV015 所记为贵阳南明区，番薯说“山药”。汪平(1994)^[41]所记贵阳城内方言为“饭薯”[fan²-ɿ ɕsu-ɿ]、“红薯”[ɕxoŋ-ɿ ɕsu-ɿ]，品种分“红心饭薯”[xoŋ-ɿ ɕi nɿ fan-ɿ su-ɿ]、“白心饭薯”[pe-ɿ ɕinɿ fan-ɿ su-ɿ]、“水果饭薯”[suei-ɿ ko-ɿ fan-ɿ su-ɿ]三种。贵州省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42]所记贵阳方言为“红心、白心饭薯ɕsu”（词目为“红、白薯”，可见已涉及具体的品种，并非通称）。不过陈章太、李行健(1996)^[32]所记贵阳方言为“蕃薯”[fan² ɕsu]，杨适(1994)^[43]所记贵阳方言为“番薯”[fan² ɕsu]，都不因“番”（蕃）字讹变为去声而怀疑其本字。

C13 也只涉及一个方言点，即安徽的歙县(富堨镇青山村)。“沙芋”大概就是“山芋”。按照孟庆惠(2005)^[44]，歙县许村古山摄开口二等字今读-ɔ，例如“山”[sɔ-ɿ]、“杀”[sɔ-ɿ]，但也有个别字读-o，例如

⁶ 孟庆惠(2005)^[44]在描写绩歙片方言的词汇时，6个方言点只列了“山芋”（代表点徽城镇）、“饭芋”（华阳镇）两种词形。按该书体例，各地说法大致相同的，只用本片代表点方言歙县(徽城)话标音。只见于某地的就用某地话标音，并用括号在词条后注明。说明绩歙片的5个点番薯都叫“山芋”，只有绩溪(华阳镇)叫“饭芋”（即“番芋”）。

“拔”[p^ho-ɿ]，因此如果“山”字读成[sɔ-ɿ]就会跟“沙”字同音。孟庆惠(2005)^[44]歙县方言收了4个点(徽城镇、深渡、杞梓里、许村)，番薯都叫“山芋”⁶。可以设想青山的情形可能正跟许村类似，山摄开口二等字的主元音开始出现个别高化现象，而“山芋”的“山”就走在了音变的前列。

3.1.4. 关于 E1 “茴”

LV015 管番薯叫“茴”的方言点总共有6个，集中分布在岳阳市及其所辖的岳阳县、湘阴县、平江县、临湘市、汨罗市，如图1所示。

“茴”字用于“茴香”，字义与番薯无涉，LV015 所记只能看作是同音字，其本字大概就是“薯”字。下面以李冬香(2007)^[45]所记的岳阳(柏祥)方言为例稍加说明。岳阳(柏祥)番薯叫“洋口”[iaŋ-ɿ fei-ɿ]，第二个音节跟“肥”、“茴”等字同音，作者按有音无字处理，我们认为本字就是“薯”，即番薯岳阳(柏祥)叫做“洋薯”。古禅母合口三等字岳阳(柏祥)今读x-，f-，s-，g-，例如“树”[xy²]、“睡”[fei²]、“熟”[səu²]、“垂”[ɕguei]。读f-的字再如：“税、睡”[fei²]、“瑞”[fei²]、“纯”[ɕfən]、“说”[fɔ²]。可见把[ɕfei]看作“薯”字声母和声调都没有问题，至于韵母，岳阳(柏祥)鱼韵字照例不读-(u)ei，把[ɕfei]看作“薯”字韵母会出现孤例的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y和-iu、-u(e)i关系密切，而且个别口语常用字读音与一般规律不同是很正常的，例如“絮”字在成都话读[ɕy²]（文读）、[suei²]（白读），-uei就是遇摄合口三等鱼(举平以赅上去)韵字里的孤例。因此把岳阳的[ɕfei]看作“薯”字从语音上看并无大碍。

当然，把番薯叫“茴”的方言并非都像岳阳(柏祥)一样，语音上能大致说得通。例如平江(南江)、平江(西



Figure 1. Dialects which call sweet potatoes “hui”
图 1. 番薯叫“茴”的方言点

江)番薯都叫[ɛfi](张双庆、李如龙 1992^[46]、朱道明 2009^[47]),但两地古禅母今都不读f-,例如“树”[fʉ²/ɛy²]、“纯”[ɛsɿn/ɛɕyn],章组鱼韵两地也不读-i,例如“煮”[kʉ^ctɕy]、“鼠”[fʉ^cɕy]。换言之,把“薯”看作[ɛfi]的本字声母和韵母都要出现孤例问题。根据“苜”(番薯)的地理分布特点,大概可以认为平江的“薯”[ɛfi]其实是从岳阳借入的(平江的fi对应岳阳的fei)。我们注意到,张双庆、李如龙(1992)^[46]、朱道明(2009)^[47]在记录平江方言词汇的时候都径用“薯”字,而没有用同音字或表示有音无字的“□”。

3.1.5. 关于 E2 “粉葛”

E2类只涉及一个方言点,即潮州(湘桥区),也就是潮州市区。潮州番薯的叫法多记作“番葛”,下面引5种材料来看(标音法和排列格式本文作了统一):

- 1) 《潮州方言》^[48]:番割hueŋ⁺ kuaʔ⁺(按:“割”应为同音字,本字为“葛”)
- 2) 《潮州市志》^[49]:番葛(番薯)(按:原书未标音)
- 3) 《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50]:番薯huan⁺ tsɿ⁺(按:新山潮州话)
- 4) 《汉语方言词汇》^[7]:番薯hueŋ⁺ tsɿ⁺~番葛 h ueŋ⁺ kuaʔ⁺(100页:潮州)
- 5) 《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51]:番薯 huan⁺ tsɿ⁺ ~ 番葛 huan⁺ kuaʔ⁺(按:曼谷潮州话)

以上5种材料,无论叫“~薯”还是“~葛”,前字都是“番”[ɕhueŋ⁺/ɕhuan⁺],不是“粉”[f⁺huŋ⁺](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8^[8], 278)。潮州周边的方言也没有出现“粉葛”的说法,例如:

- 6) 汕头(据林伦伦 1991^[52]):番薯 huan⁺ tsu⁺ ~ 番葛huan⁺ kuaʔ⁺甘薯
- 7) 澄海(据林伦伦 1991^[53]):番薯 huan⁺ tsə⁺ ~ 番葛huan⁺ kuaʔ⁺甘薯
- 8) 揭阳(据蔡俊明 1976^[54]):番薯 huan⁺ tsə⁺ ~ 番葛 huan⁺ kuaʔ⁺甘薯
- 9) 南澳(后宅,据林伦伦、林春雨 2007^[55]):番薯 haŋ⁺ tsu⁺ ~ 番葛 haŋ⁺ kuaʔ⁺甘薯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专业 2011 级硕士生温东芳帮助核对潮州市区番薯的说法,所提供的语料为“粉葛”[huŋ⁺ kuaʔ⁺]~“番薯”[hueŋ⁺/huan⁺ tsɿ⁺/tsə⁺],没有调查到“番葛”的说法。其家乡普宁市

的潮汕话则只说“番薯”[huan⁺ tsə⁺/tsɿ⁺],不说“粉葛”。看来潮州话存在“粉葛”的说法是不成问题的。但潮州市区是否存在“番葛”的说法仍需要进一步调查,此外各地潮州话里的“番葛”和“粉葛”是一种什么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先有“粉葛”,后来受“番薯”的影响产生了“番葛”,还是先有“番葛”,后来改说成了“粉葛”,还是根本就是各自创新,“番葛”和“粉葛”并不存在演变关系?)希望研究潮语的学者能结合文献资料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3.1.6. 关于 E5 “其他”

E5为LV015未提供具体词形的方言点,共有6个。为了让这6个县市的方言在下文的地图中不至空缺,在不求地点吻合的前提下本文将以所能查到的语料为依据。

句容市南郊华容镇:山芋sa⁺ ɿ⁺(据周芸 2007^[56],“芋”原标作31⁺调,据19页同音字表改为53⁺调)。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1960)^[57]所记相同,但没有标音。LV015的调查点为句容经济开发区。

高淳县:山萝卜ɕie⁺ lo⁺ po⁺ ~ 山芋 ɕie⁺ y⁺(据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8^[58])。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59]所记为“山萝卜”[ɕie⁺ loʔ⁺ o⁺]。LV015的调查点为高淳淳溪宝塔村。

苍南县炎亭镇:番薯ɕfa⁺ ɛy⁺ɿ⁺(据秋谷裕幸 2005^[60],原书词汇按实际调值记录,本文根据原书提供的连读变调规律稍做调整)。“薯”即“薯”。LV015的调查点相同。

温岭县:蕃薯ɕfe⁺ ɛzɿ⁺(据杭州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组 1959^[61])。温岭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62]所记为:番薯ɕfe⁺ ɛzɿ⁺ | 番□ɕfa⁺ ɛfiu⁺。阮咏梅(2012)^[63]所记为:番薯 fa⁺ fiu⁺。但39页同音字表用本字不明的“□”。LV015的调查点为温岭石桥头东花桥。“蕃(番)薯”的本字大概即“番薯”。“番□”ɕfa⁺ ɛfiu⁺的本字大概也是“番薯”(ɛfiu⁺可看作ɛzɿ⁺一类音的弱化;上一条苍南县炎亭镇的“薯”ɛy⁺也是一种弱化)。

海口市:番葛huan⁺ kua⁺(据陈鸿迈 1996^[64])。LV015的调查点为海口市琼山区。按陈鸿迈(1996)^[64]的引论介绍,海口方言和距市区中心5公里的琼山县府城镇居民所说的话相同。琼山县即今琼山区。

万宁市区:番薯(承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杜依倩老

师告知)。LV015 的调查点为和乐港北港上。据杜依倩老师了解的情况,和乐镇港上村和港下村合称港北,港上、港下的方言大体相同。港北既说“番葛”,也说“番薯”,甚至还有说“口葛”[ni¹/nien¹ kua¹]的印象记音),情况比较复杂。本文以市区的说法为准。

3.2. 词形重分类

在前文有关本字及词形若干说明的基础上,可以把表 2 的词形重分为 6 大类 47 小类,如表 3 所示。

表 3 的大类用 A~F 表示,并分别以关键字标明大类的名称。大类以方言点数降序排列。小类用表格第一列的阿拉伯数字区别。每个小类都标明词形、表 2 中的类别以及方言点数。例如新 C 类为“地瓜”类,总共有 60 个方言点,分 C1、C2、C3 三个小类,分别由表 2 的 D1(地瓜[56])、D2(地瓜~红薯[3])、D3(地瓜~芋头[1])构成。余类推。

表 3 和表 2 的主要不同点有:1) 将表 2 的 B 类(即“苕”类)合并到 A 类(即“薯”类);2) 不设杂类。表 2 的 D、E 两类都可以视为杂类,至少 E 视为杂类是没有问题的。不设杂类的原因是番薯一词的词形及地理分布总体上不算复杂,没有设置杂类的必要。从小类的情况看,除了表 2 的 E5 在表 3 中拆归新的 A9、

B7、E3、F2 类外,其他的原小类都未作拆分处理。

从表 3 可以看到:1) “薯”类占压倒性多数,约为 78%,几近 4/5。2) 非主流词形中超过 100 个方言点的只有 1 个,即“芋”类词形。3) “薯”类词形的小类最为复杂,达 24 个之多,“芋”类词形的小类次之,有 12 个,“地瓜”类词形、“山药”类词形和“萝卜”类词形的小类都是 3 个,“葛”类词形只有 2 个小类。4) “萝卜”类词形和“葛”类词形的方言点数都非常少。

4. “番薯”解释性地图的绘制及初步分析

4.1. 解释性地图的绘制

在表 3 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整理出绘制解释性地图所用的词形大类表,如表 4 所示,其主要特点是把兼类单独列出(不考虑 LV015 原先的前后次序)。

根据 LV015 的地图数据以及表 3 和表 4 的分类,可以制作出如图 2 所示的“番薯”的解释性地图。

4.2. 各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大势

A 类(“薯”类)词形方言点数最多,除东三省和苏沪皖鲁外,几乎都是它的分布区域,例外主要见于

Table 3.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fanshu*'s word forms
表 3. 番薯词形的重分类

A. “薯”类[729]		B. “芋”类[112]	
1/13	A1 红薯[210]、红苕[52]、B2 红苕~红薯[3]	A13 花薯[1]	C1 红芋[17]
2/14	A2 红薯~番薯[3]、B4 红苕~番苕[2]	A14 萝卜薯[1]	C2 红芋~白芋[2]
3/15	A3 赤薯[2]	A15 山薯[9]	C3 红芋~山芋[3]
4/16	A4 黄薯[3]	A16 老薯[1]	C4 白芋[2]
5/17	A5 白薯[16]	A17 薯[32]、B7 苕 [22]、E1 苕 [6]	C5 白芋~山芋[1]
6/18	A6 甘薯[2]	A18 薯一[14]	C6 花芋[2]
7/19	A7 甜薯[2]	A19 薯薯[3]	C7 山芋[50]、C13 沙芋[1]、E5[1]
8/20	A8 糖薯[1]	A20 薯棒[3]	C8 山芋~番芋[1]
9/21	A9 番薯[316]、B6 番苕[2]、E5[3]	A21 薯脑壳[1]	C9 山芋~芋头[1]
10/22	A10 胡薯[1]	B5 红苕~红芋[2]	C10 山芋~地瓜[2]
11/23	A11 京薯[3]	B8 苕~红薯[7]、B3 红苕~苕[3]	C11 番芋[22]、C12 饭芋[1]
12/24	A12 根薯[2]	B9 苕~番薯[1]	C14 芋头[6]
C. “地瓜”类[60]		D. “山药”类[23]	
1	D1 地瓜[56]	D4 山药[21]	E3 甘萝卜[1]
2	D2 地瓜~红薯[3]	D5 山药~甘薯[1]	E4 山萝卜[2]
3	D3 地瓜~芋头[1]	D6 白山药[1]	E5 山萝卜~山芋[1]
		E. “萝卜”类[4]	
		F. “葛”类[2]	

Table 4. The classification of word forms for interpretive maps
表 4. 解释性地图的词形分类

绘图类	跟表 2 新类的关系	地图所用符号	方言点数
A	除 A22 外的所有 A 类	●	727
AB	A22	●	2
AC	C2	▲	3
AD	D2	◆	1
B	除 B10 外的所有 B 类	●	110
BC	B10、C3	▲	3
BE	E3	●	1
C	除 C2、C3 外的所有 C 类	▲	56
D	除 D2 外的所有 D 类	◆	22
E	除 E3 外的所有 E 类	■	3
F	F 类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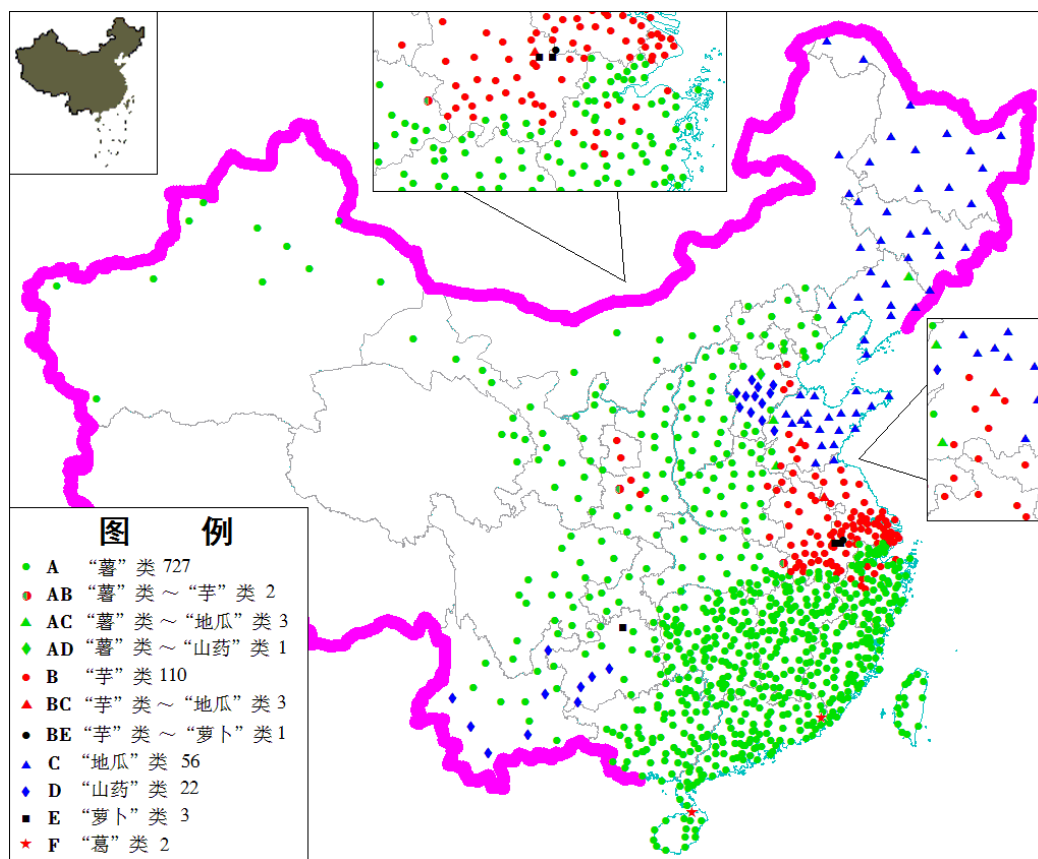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interpretive map of fanshu "sweet potato"
图 2. “番薯”的解释性地图

贵州、云南、河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

B类(“芋”类)词形是非优势词形中势力最大的，集中分布在苏沪皖地区及毗邻的鲁豫部分地区，此外

河北、天津、浙江、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陕甘地区的“芋”类词形几乎是一种线状分布。

C类(“地瓜”类)词形集中分布于山东省的大部

分地区及东三省。

D类(“山药”类)词形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中南部地区,山东毗邻河北的地区也有少量分布。

E类(“萝卜”类)词形属于零星分布,见于安徽、贵州两省的个别方言点。

F类(“葛”类)词形也属于零星分布,见于广东、海南两省的个别方言点。

表4中的其他五类词形(AB、AC、AD、BC、BE)实际上是上述6类词形(A~F)中若干类的两两兼用,而且属于零星分布。其中AB只有2个方言点,分别见于陕西西部和湖北东部, LV015归B5“红苕~红芋”; AC只有3个方言点,分别见于鲁西(2)和辽宁省北部(1), LV015归D2“地瓜~红薯”; AD只有1个方言点,见于河北省中部, LV015归D5“山药~甘薯”; BC只有3个方言点,分别见于鲁西、苏北和皖东, LV015分别归D3“地瓜~芋头”(鲁西)和C10“山芋~地瓜”; BE只有1个方言点,见于江苏西南, LV015归E5“其他”(参看前文3.1.6)。

4.3. 分析与讨论

4.3.1. 关于“地瓜”类词形

“地瓜”类词形主要分布在山东省(鲁西南除外)和东三省(参看图2及4.2的相关说明)。山东的番薯是在乾隆初期分别由海上和运河两路从南方传入的(参见陈冬生 1991^[65]),此后在山东各地迅速传播。东北则晚至清末才在方志里出现了有关番薯的记载(参见宋军令 2007^[30])。从移民史来看,“地瓜”类词形的地理分布格局应当与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直接相关。“闯关东”的高潮出现在清末民初,主要移民是河北人和山东人,其中又以山东人为多(参看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 1993^[66])⁷。也就是说,山东人不仅把已在山东落脚的、易种且高产的番薯传到了东北,而且把番薯的称呼“地瓜”也带到了东北。东三省番薯称谓的高度一致性是十分引人注意的。

4.3.2. “芋”类词形和其他词形的交错

1) 基于解释性地图的观察

图2已经可以大体呈现“芋”类词形和其他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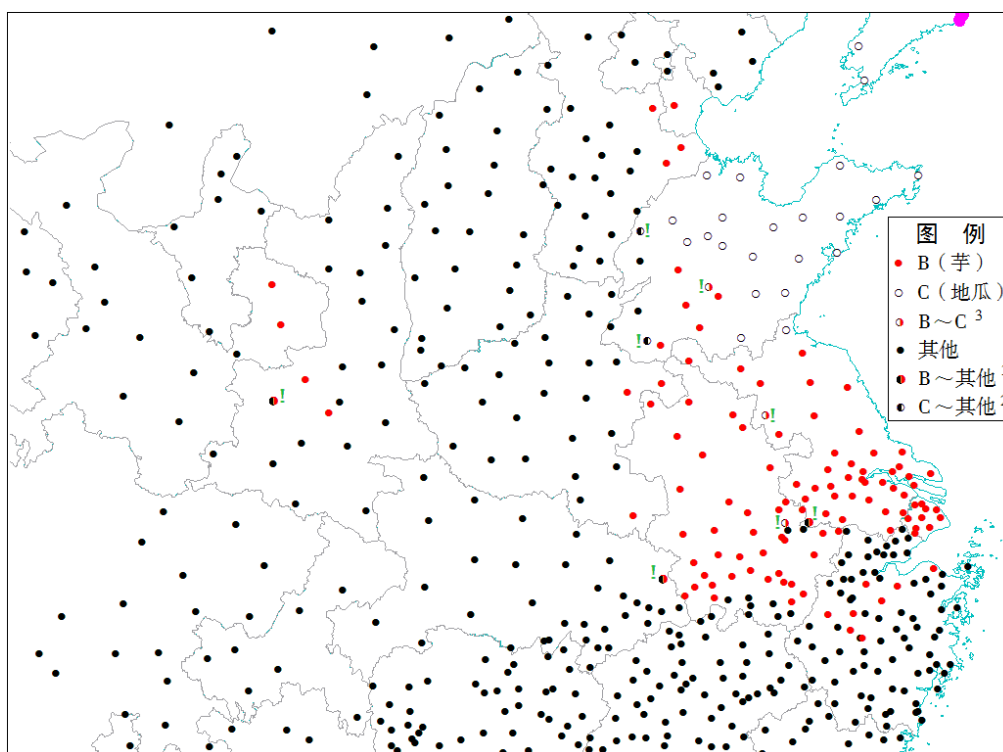


Figure 3. The interlacing of the “yu” category and other word forms
图3. “芋”类词形和其他词形的交错

⁷胡焕庸曾指出东三省是在全国各省区中“人口迁入最多的地区”,在东北三省的迁入人口中,山东籍人口又“占到总迁入人口的70%~80%”(《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序》^[67])。

的交错情况。为了更清楚地观察这一点,需要进行局部放大并适当调整图例,如图3所示。

图3主要关注“芋”类词形(B),除“地瓜”类词形(C)外,其他词形(A, D~F)一律概括为“其他”。B、C类兼用或B、C与“其他”兼用的情况都在图例中标出方言点数,并在方言点旁加绿色感叹号以方便查找。

图3跟图2相比,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只少了2个:①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海阳村),不在图3所截取的范围内。海阳兼用“地瓜”和“红薯”,“红薯”大概是从共同语进入的。②河北徐水县(漕河镇米家营村),兼用“山药”和“甘薯”,“甘薯”大概也是从共同语进入的(参看下文5.3)。因为“山药”和“甘薯”都属于“其他”,所以图3不反映其兼用的情形。

图3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总共有8个,其中6个都可以直观看出是两类词形接触产生的效应,只有江苏泗洪县(石集乡新汴村)和安徽芜湖市(鸠江区湾里镇银湖社区)在“芋”类词形分布的腹地出现了跟“地瓜”类词形的兼用,其性质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图3可以明显看出“芋”类词形通过京杭大运河向北扩散的路线,不过它在山东北部似乎断开了。LV015由于布点不够密,华北只出现4个说“山芋”的方言点(天津和河北霸州、南皮、黄骅)。按照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大运河的起点通县(今北京市

通州区),河北石家庄、保定、邯郸、唐山,山东东平,使用的词形都是“山芋”。大运河在“芋”类词形的扩散上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影响途经城市并扩散到附近的城市)。

“芋”类词形分布区南部的错杂现象尤其让人注意。杭州湾一带出现了集中分布的黑圆,大体为红圆所包围,但其南边的红圆大体只是一条东西向的带子,缺乏地理纵深度。

2) 基于描写性地图的观察

杭州湾一带“芋”类词形与“薯”类词形的错杂分布格局如果仅仅根据省略了大量词形细节的解释性地图,实际上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的,因此需要绘制反映词形细节的描写性地图。图4可以满足观察的需要。

图4由左右两幅分图组成。左图系LV015图的局部模拟,右图则是根据本文表3的分类框架对左图进行调整的结果。为了醒目,图例也做了重新设计。每种词形都标明方言点数。下面的讨论以图4的右图为准。

从图4可以看到,“番薯”(67)和“山芋”(48)是这一区域的优势词形,“番芋”(22)、“红芋”(9)、“山薯”(8)也具有一定的数量,而其他词形在这一区域都是偶发性的。

“番薯”和“山芋”两种优势词形在这一区域的邻接分布所产生的一个效应是混合词形(bl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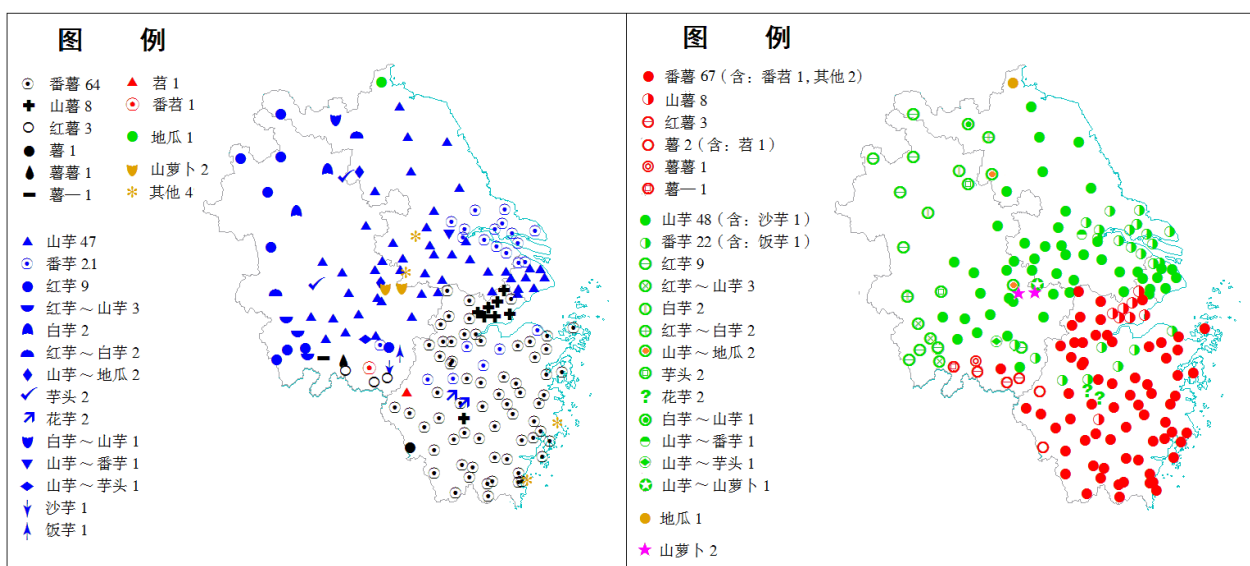


Figure 4. The word forms of *fanshu* “sweet potato” in the reg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nhui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e and Shanghai City
图4. 浙皖苏沪地区的番薯词形

portmanteau word)的产生。混合词形指用某一词形的前一部分加上另一词形的后一部分所造成的新词形⁸，中国学者也称为“合璧词”。方言接触地区常常出现混合词形。基于“番薯”和“山芋”这两种词形可能产生的混合词形有“番芋”和“山薯”两种，而图4明白显示出在红圆和绿圆之间既有“山薯”，也有“番芋”。“山薯”在德清-海盐-嘉善一线(杭州湾北边)，但浙南的武义也说“山薯”。“番芋”则在淳安、建德-富阳、诸暨-绍兴县、慈溪一线。与建德紧邻的兰溪、金华(绿色问号所代表的方言点)使用的词形是“花芋”，我们颇疑心它是“番芋”的一种语音讹变形式，因为番薯和芋头都开花。

可以设想金华以北原先大概都是使用“山芋”的地区，当时浙北不一定实际种植番薯这种作物，只是随北边的苏沪皖这么叫，后来“番薯”在杭州一带落地生根，并逐渐四扩。而“番薯”和“山芋”的对冲结果是孕育出了“山薯”和“番芋”。下面引两种浙北的地方志以见一斑：

嘉庆十三年(1808)《余杭县志》卷三十八“物产·蔬笋之属”：番薯，土名番薯，旧非土产，近年多闽粤蓬民，不种苧麻，即种番薯，山遭垦松，遇潦即沙土随水入河，溃堰淤港，屢为农田水利之患。

道光九年(1829)《武康县志》卷四“地域志·水利”：嘉庆建元以前，邑中水道本利。自温州棚民租山垦掘种芋番芋，厥土松缺，一遇淫霖积潦，山上沙砾随水奔集于溪，溪路遂出处淤塞，甚为阖邑田庐之害，官保阮元抚浙时檄饬严禁。

3) 词形混合并不能解释一切

“真理迈过一步就是谬误”。上文曾指出淳安-慈溪一线的“番芋”是“番薯”和“山芋”两种优势词形接触产生的混合词形，但并非所有的“番芋”都一定是方言接触的结果。从图4可以看到，长江入海口两岸(包括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十几个县)有一个“番芋”的连续分布区，它大体被“山芋”分布区所包围。这一带未见“番薯”词形的分布，因此不存在“山芋”和“番薯”的接触问题。长江入海口两岸的“番芋”

不能认为是“山芋”和“番薯”的接触结果。之所以会在这一带形成一个“番芋”的连续分布区，可能与番薯传入苏沪的时间及路线有关。

虽然早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徐光启就曾把番薯引入松江地区，但直到康熙年间江南各府的物产记载中仍很少见到番薯，可见这次引种影响甚微(参看郭松义1986^[29]、曹玲2003^[70]、宋军令2007^[30]、郑南2010^[71])。不过康熙二十年(1681)的《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却著录了番薯：“甘薯，俗呼蕃瓜。”到雍正五年(1727)的《崇明县志》卷九“物产”则明确记载：“甘薯，俗呼番芋，又名红山药，种自普陀来。”普陀山很早就有了番薯，这一点万历二十三年(1595)和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普陀山志》及明末李日华的《紫桃轩又缀》都有记载，字形写作“番芾”或“番葛”。普陀山地处海中，其番薯当由北上的福建船舶甚至是南洋船舶带来。而崇明位于长江入海口，番薯通过海路由普陀山再传入崇明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后乾隆年间金榜的《海曲拾遗》卷六“物产类”又记载了南通地区普遍种植番薯的情况：“芋类……又名番薯，俗呼番芋，……种得自舟山，今江北高原人皆种以佐餐。”据此，南通地区的“番芋”，亦即番薯，当由崇明传入。而相比之下，邻近的江南各府普遍种植番薯则基本要到乾隆年间甚至以后。以下是相关方志的记载：

钱思元《吴门补乘》(乾隆三十八年[1773])卷二：山芋，今吴地亦有之，可代饭，饥年贫者赖之。

光绪四年(1878)《重修奉贤县志》卷十九“风土志”：近有温州余姚等处客民来……播种山芋，今本地居民效法传种。

光绪十年(1884)《松江府续志》卷五“物产”：山芋，近年客民于沿海沙地种之。

光绪十一年(1885)《丹阳县志》卷二十九“风土志”：山芋，俗名海萝卜，向非土产，近则北山多种之。

可见，番薯在苏沪的传播可分为两期。早期从普陀山传播到崇明，进而扩散到周边地区，使用的词形是“番芋”；晚期由北上垦殖的闽粤和浙南客民再传播到其他各地，使用的词形是“山芋”。“番芋”之于源出地的“番薯”，虽然词根“薯”换成了本地更易于接受的“芋”，但尚未去“番”化；至于“山芋”，

⁸Matthews(2000)^[69]对 **blend** 的解释是：“Word formed by joining the beginning of one form to the end of another. e.g. *smog*, formed in 1905 from *smoke* and *fog*.”(由一个词的前一部分加上另一词的后一部分混合而成的词，例如产生于1905年的 *smog*[烟雾]，是由 *smoke*[烟]和 *fog*[雾]混合而成的。)

则是一个去“番”化的全新词形了(参看下文 5.2)。

4) “红芋”也是一种混合词形

图 4 里的“红芋”方言点数比“山薯”还略多, 主要分布在安徽西部, 皖南也有少量分布。根据 LV015, 安徽以西主要是“红薯”的分布区: 河南的主要词形就是“红薯”, 赣北也有成规模的“红薯”分布, 与皖南的“红薯”连成一片, 只有鄂东以“苕”类词形的分布为主。“红芋”分布区大体就夹在“红薯”分布区和“山芋”分布区的中间, 把皖西的“红芋”看作“红薯”和“山芋”的混合结果是非常自然的, 如图 5 所示。图 5 的关注焦点是“山芋”类词形和“红薯/红苕”类词形的互动, 与此无关的词形都处理为“其他”。所标的方言点数只起一个参考作用, 未必在地图中都得到了展现。

有意思的是皖西的“红芋”跟陕甘成线状分布的“山芋”大体隔河南相望, 呈现 ABA 分布态势。如果由此推导出原先河南也是“红芋”分布区的结论(即原先“红芋”从皖西到陕甘存在着一个连续分布区), 恐怕就有些大谬不然了。根据文献记载, 河南传入番薯后所用的名称主要有“地瓜”、“番薯”、“甘薯”、“红薯”等, 例如: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蔡县志》卷之四“食货志·物产·瓜类”: 地瓜。

康熙三十四年(1695)《汝宁府志》卷之六“食货·物产·蔬类”: 地瓜。

乾隆十年(1745)《洛阳县志》卷二“物产”: 薯蕷, 俗名山药。近种红薯亦佳。

乾隆三十五年(1770)《通许县志》卷之一“物产”: 番薯。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光山县志》卷十三“物产”: 番薯, 种出南番, 故名。有红白二种, 邑产俱红者, 故土人呼红薯。

道光八年(1828)《泌阳县志》卷三“土产”: 甘薯, 即红薯也, 一名番薯。

“地瓜”、“番薯”、“甘薯”都不一定是本地的称呼, 但“红薯”却一再被指明为“土名”(如同治十年[1872]《叶县志》)、“俗呼”(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鹿邑县志》), 其方言身份确凿无疑。言有易, 言无难。虽然在没有穷尽所有文献的情况下, 我们并不能断言河南的历史文献中一定没有“红芋”, 但番薯传入河南后通行的叫法是“红薯”而不是“红芋”这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可见, 如果仅仅根据“红芋”和“红薯”的 ABA 分布而推断河南原属“红芋”分布区, 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尴尬的情况还不止于此。从图 2 还可以看到, “山药”类词形也呈 ABA 分布态势(“山药”类词形—“薯”类词形—“山芋”类词形), 因此似乎也可以假设“山药”曾经在从云南到河北的这一广阔空间连续分布。由于“山药”的 ABA 分布正好跟“红芋”的 ABA 分布交叉, 为了避免两者冲突, 还必须错开时间, 即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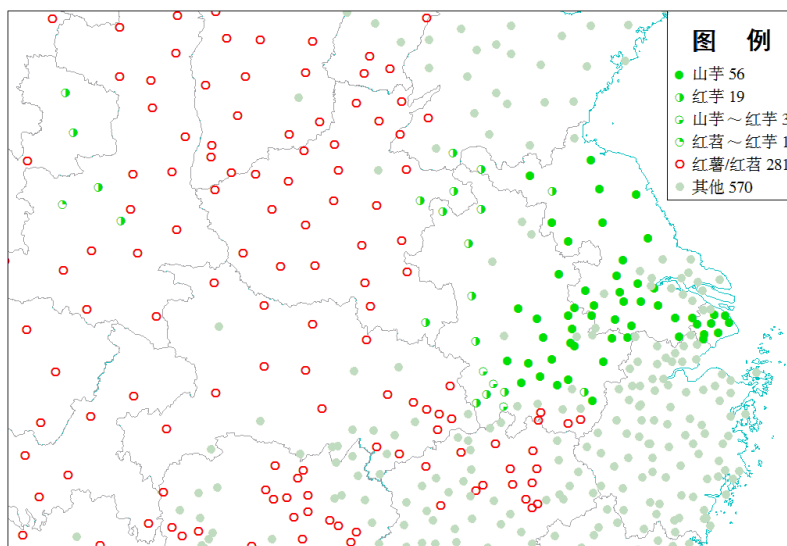


Figure 5. The contact effect of “hongshu” and “shanyu”
图 5. “红薯”和“山芋”的接触效应

先是“山药”的连续分布，然后是“红芋”的连续分布，最后是“薯”类词形的连续分布。上文已指出，番薯传入河南后通行的叫法是“红薯”，因此河南在历史上既不存在“红芋”的大面积连续分布区，当然也不存在“山药”的大面积连续分布区。连一个河南都说不通，设想“山药”在从云南到河北的这一广阔空间连续分布就无异于是天方夜谭了。铃木史己(2009)^[6]已指出“〈甘薯〉义‘山药’分布在河北及云南，呈现出远隔分布，但是不能解释以前呈现出连续性分布。”最后一句话有些拗口，意思大概是不能根据远隔分布假设“山药”原先是呈连续性分布的。

事物的传播往往存在多种方式，相同的地理分布格局的成因也可以有所不同，因此单纯的地理格局分析并不一定能把我们引入真理之门。福建、广东是最早引种番薯的省份，因此番薯的传播主要就以这两个省作为始发站，从南到北不断扩散。根据图2，云南和河北大体是这一传播范围的边际地区，其“山药”的说法大概是平行创新的结果。陕甘一带的“红芋”则应为苏皖一带“芋”类词形跳跃式扩散(diffusion by jumping)的结果。下面略引几种材料加以说明。

陕省物产五谷之外，可佐民食者甚少……有甘薯一种，俗名番薯，又名红薯，其形圆长，紫皮白肉，养人与稻米、小麦同功。其种来自海外，闽、广最多，浙江之宁波、绍兴，江南之崇明，河南之汝宁州，江西之广信、建昌、赣州、南安皆有之。近来江北亦皆试种，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终岁足食。……陕西地高阜多沙土，尤易发生，惜乎人不知种植，亦不见此藤种。目下以觅种为第一义，或藤或果，俱可作种。凡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竟可散之民间，教人种植，费力无多。一年生薯，其藤无数，一处得薯，到处传种，不几年而遍一邑矣。缙绅商贾从闽、广、浙、江、蜀、豫等往来者，带回布种，如本地现有此薯，亦即推广劝种以广利济。(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二十，《劝种甘薯示》，乾隆十年[1745]四月)

前曾刊发告示劝种甘薯，并令各官就便寻觅薯种试种，今已据蒲城张令、潼关王令、临潼刘令、兴平许令，略阳柳令署、甘泉唐令等县，从江、浙、豫、蜀各省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或署中现有

曾经种薯之人，盩厔县彭令禀称已经从家乡觅种雇人等情，宁羌侯牧亦有由川购觅薯种之说。(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十二，《劝民领种甘薯谕》，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

山芋，即红薯，又呼地白，春夏间随时可种，切丝晒干，可以备荒。(光绪三十四年[1908]《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植物·谷类”)

羊芋生山坡地，可作谷食。又一种红芋，味甘美，植之易生，获利甚厚，兼可救荒。(宣统元年[1909]《甘肃新通志》卷十二“物产·蔬类”)

芋有红白二种，红即红薯。白者俗名芋头，由陆路运至省城、咸阳、泾、原、郿、武，每年约销六百万斤，本境约销二百万斤。(清佚名《郿县乡土志》下“商务”)

陈宏谋时任陕西巡抚，为利民生，要求正杂各官“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缙绅商贾“从闽、广、浙、江、蜀、豫等往来者，带回布种”，从今天陕西番薯的称呼主要为“红薯”来看，大概从河南引种的影响最大。苏皖一带的“芋”类词形大概因贸易的缘故传到了陕甘(参看上引《郿县乡土志》)，而且比较晚近。大体而言，陕甘地方文献中出现“芋”类词形的时间已近民国。

4.3.3. “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及其词源再证

1) 岳西方言的“苕”

前文 3.1.2 已指出薯蕷义或番薯义的“苕”本字就是“薯”字，来源是《广韵》平声鱼韵署鱼切的“薯”，它不是“山药”的合音字。下面再以岳西方言为例进一步说明(语料据储泽祥 2009^[72])。

红芋 xon¹ ɥ¹番薯

红芋苕 xon¹ ɥ¹ sau¹小而细长的番薯

萝卜苕 lo¹ p^ho¹ sau¹小而细长的萝卜

山药 san¹ io¹

可见岳西番薯的通称是“红芋”，而薯蕷仍叫“山药”，没有发生合音，而且即便发生合音，合音结果也不会是[ɕsau¹]，而是[ʃo¹]或[ci¹o¹]。对岳西方言来说，“苕”大概是一种残存形式，只保留在特殊的词汇里，而通称已被新起的“红芋”所替换。其中“红芋苕”大概是新旧合璧词。道光七年(1827)《桐城续

修县志》卷二十二“物产志·蔬之属”的以下记载颇值得注意：

山薯，薯音若殊，亦若詔，今称若许，桐城呼为山芋。向自江西船载来卖，今桐城各乡皆种之，但稍小耳。

上述记载似可说明“薯”字读音的变迁及桐城用词的变化。即“薯”原本读若殊或詔(均为平声)，今则读若许(上声)；“向自江西船载来卖”，今则“桐城各乡皆种之”，“山薯”大概是随江西人的叫法，而“山芋”则为桐城自呼。“薯”字的平声读法主要见于南方，读上声显然是受到了共同语的影响。江西丰城、鄱阳番薯今仍叫“山薯”[ɛsan¹ ɛsy¹/ɛsan¹ ɛcy¹]。丰城 LV015 的调查点为河洲街道城南村，本文据丰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89)^[73]。鄱阳 LV015 的调查点为鄱阳镇风雨山村，记录的词形是“红薯”，这里根据的是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桐城的南邻安庆番薯也叫“山薯”[ɛsan¹ ɛtʂ^hu¹]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68])。岳西、丰城、鄱阳今通行赣语，桐城、安庆今通行江淮官话，与皖西赣语相邻，把它们材料合在一起，正好可以说明上引《桐城续修县志》中的记载。

2) “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

LV015 图已经可以较好地显示“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即地图上用红色符号表示的部分。为了凸显“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仍需要绘制新的地图。图 6 图大体可以满足观察的需要。图 6 只区分“苕”类词形、“薯”类词形和其他词形三类，并略增一些“苕”类词形的方言点，碰到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原则上按照“苕 > 薯 > 其他”的优选顺序加以简化(即忽略非优选词形)，但清原、徐水仍以“地瓜”和“山药”优先(参看上文 4.3.2. 1))。新增的“苕”类词形方言点为：

休宁(海阳) 红苕 xɛn¹ ɕio¹(据孟庆惠 2005^[44])

休宁(溪口) 红苕 xɛn¹ fo¹(据刘丽丽 2007^[74]，刘直接写本字“薯”)

屯溪 红苕 xan¹ ɕio¹(据钱惠英 1997^[75])

黟县 番苕 fɔɛ¹ so¹(据孟庆惠 2005^[44])

黟县(宏村) 番苕 fo:v¹ sau¹(据谢留文、沈明 2008^[37])

岳西 红芋苕 xoŋ¹ ɕi¹ ʂau¹小而细长的番薯(据储泽祥 2009^[72])

内丘 苕(据李行健 1995^[76])

南阳 红苕(据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68])

渭南 红苕 xoŋ¹ ʂau¹(据马毛朋 2003^[77])

天水 红苕 ɛxuŋ ɛʂao(以下 3 点据陈章太、李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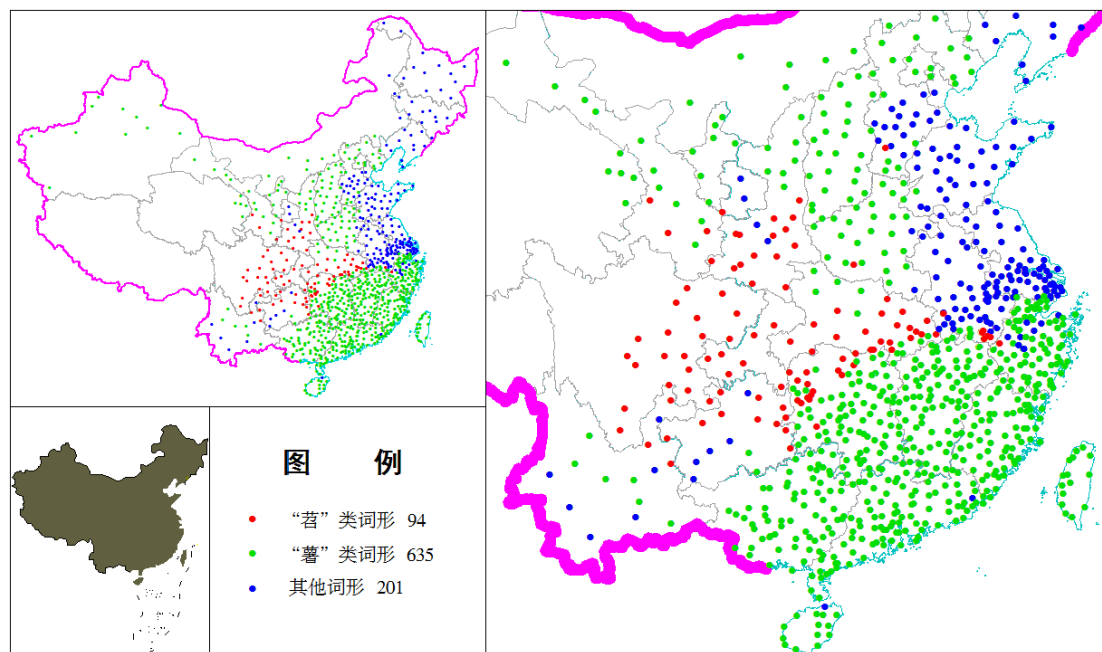


Figure 6.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hao” category
图 6. “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

健 1996^[32])

汉中 红苕 [xuŋ²¹ ʃau²¹](也说“红薯” [xuŋ²¹ ʃu²¹])

宝鸡 红苕 [xuŋ²¹ ʃɔ²¹](也说“红薯” [xuŋ²¹ ʃu²¹]、
“红芋” [xuŋ²¹ y²¹])

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记载河北邯郸番薯说“苕”，而陈章太、李行健(1996)^[32]所记为“白薯” [pai ʃu²¹]、“红薯” [xuŋ²¹ ʃu²¹]。李行健(1995)^[76]指番薯的“山药”、“山芋”、“地瓜”三种词形里都出现了“邯”，而“苕”则只有“邯：内”一个地点，按该书体例，“邯”代表邯郸市，“内”代表内丘县。因此河北说“苕”的方言大概是内丘而非邯郸。河南南阳陈安子(2011)^[78]在“同名异实”项下举的例子是“薯：红薯(南阳)、白薯(北京)、红苕(四川)、蕃薯(广东)、地瓜(山东)等”，如此则南阳的“红苕”似有可疑，但根据张启焕、陈天福、程仪(1993)^[79]，河南确有“红苕”的叫法，可惜没有说明地点，本文暂且采用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的记录。根据陈章太、李行健(1996)^[32]和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乌鲁木齐番薯叫“红苕” [xuŋ²¹ ʃau²¹]，陈汝立、周磊、王燕(1990)^[80]番薯未立词条，周磊(1996)^[81]只有“红薯” [xuŋ²¹ ʃu²¹/fu²¹]一种说法。乌鲁木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0)^[82]第五编第四章“作物种类”没有提到番薯。因此番薯可能并非乌鲁木齐的土产，所以叫法会随着番薯的来源地而有变化。图 6 仍按 LV015 的“红薯”处理。

上述方言“苕”字的读音多数都是阳平，但也有非阳平的。汉中“红苕” [xuŋ²¹ ʃau²¹]读上声大概是受到了“红薯” [xuŋ²¹ ʃu²¹]的感染。天水“红苕” [xuŋ²¹ ʃao²¹]读阴平、乌鲁木齐“红苕” [xuŋ²¹ ʃau²¹]读上声则分别跟这两个方言阴平与阳平合流、阳平与上声合流

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有些方言是在借入“苕”字的过程中按照调型调值接近的原则把“苕”错归成其他调类了。

从图 6 可见，“苕”类词形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北部、陕西南部、湖北大部、云南北端和安徽南端。此外浙西、河南、河北也有散点分布。以下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 “苕”类词形大体连片分布，形成了一个东细西粗的喇叭形；2) 皖南、浙西有一个小范围的密集分布区，它跟主要分布区之间是断开的；3) 河北(内丘)孤点深入华北腹地。按李行健(1995)^[76]的记录，内丘使用六种词形(“红薯”、“山药”、“苕”、“山芋”、“番薯”、“地瓜”)⁹，令人颇生疑惑，是否可以采信需要进一步调查。

于是我们需要在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苕”类词形目前的这种地理分布格局是东扩的结果还是西扩的结果？前一种情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楔子向东突入鄂皖，而后一种情形则活脱脱是一幅喇叭放大效应的景象，越向西积聚的扩散能量越大，使得西部形成“苕”类词形一统天下的局面。

番薯的传播主要是以福建、广东为大本营的北扩和西进，再加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假设“苕”类词形自东向西扩散是比较自然的。可是借助方言的优势进行用词的反向扩散也是完全可能的，即四川一带的番薯是由东向西传入的，可是指称这种事物的名称却出现了由西向东的反向扩散行为，因为上江官话对湘鄂两省的影响很大。很显然，图 6 本身并不能提供答案。看来方言地图的解释程度过高有时也会令人迷失。图 7 是在 LV015 的基础上重新设计绘制的解释性地图，但保留了必要的词形细节，其词形分类如表 5 所示。

Table 5.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o” and “shu” categories
表 5. “苕”、“薯”类词形的重新分类

图 7 的“苕”类词形	对应的 LV015 原类	图 7 的“薯”类词形	对应的 LV015 原类
B1 苕 [31]	B7[22]、B8[7]、B9[1]、新增[1]	A1 薯 [38]	A17[32]、E1[6]
B2 番苕 [4]	B6[2]、新增[2]	A2 番薯 [319]	A9[316]、E5[3]
B3 红苕 [65]	B1[52]、B2[3]、B5[2]、新增[8]	A3 红薯 [210]	A1
B4 红苕~苕 [3]	B3	A4 (无) [0]	无
B5 红苕~番苕 [2]	B4	A5 红薯~番薯 [3]	A2
B6 红芋苕 [1]	新增	A6 其他 [65]	其他(所有其他 A 类)

⁹其中“红薯”一词并未标注明确地点，只是笼统地说“全省大部分县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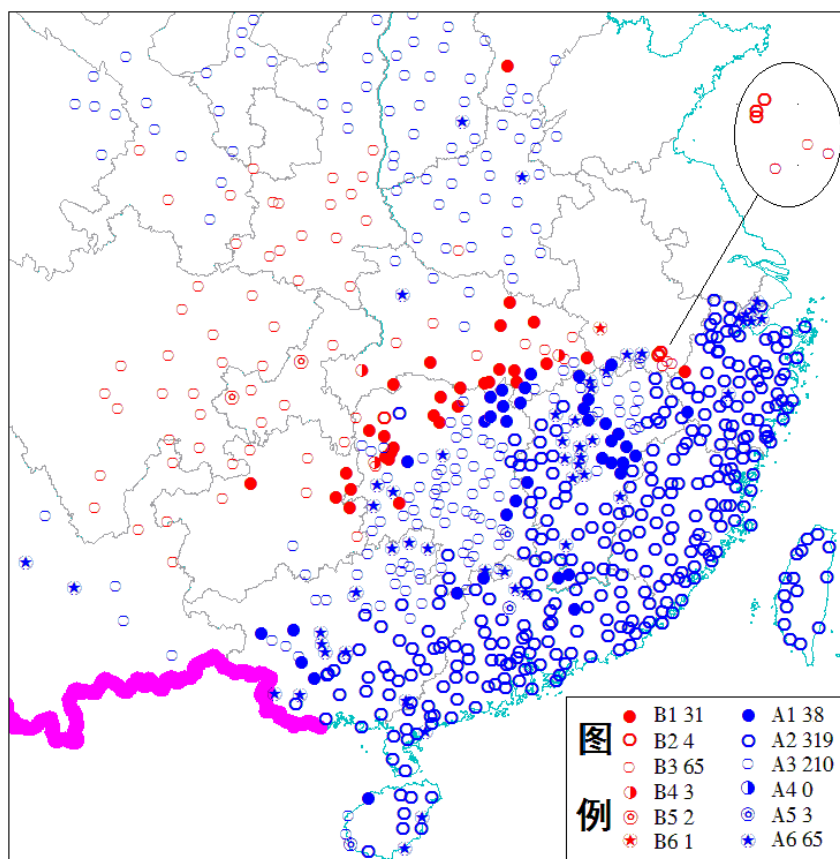


Figure 7. The interpretive map of the “shao” category
图 7. “苕”类词形的解释性地图

图 7 的关注焦点是“苕”类词形(B), 106 个方言点都全部展现在地图上(在 LV015 的基础上新增了 12 个方言点), “薯”类词形(A)则只是提供一个参照背景, 所涉的方言点并没有完全展现在地图上, 而“苕”类词形和“薯”类词形之外的其他词形则完全予以忽略。

图 7 所提供的方言地理景观可以说相当明晰。东南滨海地区及海岛几乎是“番薯”的天下, 只有海南岛显得比较杂乱。单音节的“薯”、“苕”都在内陆, “苕”北“薯”南, 其中“苕”在湘鄂、赣皖的交界一线形成了一条横亘中部的东西向宽带, “薯”则完全分布于红色宽带以南, 总体上显得较为分散。“苕”类词形分布区的西部几乎是清一色的“红苕”。使用“番苕”的方言点不多, 有 4 个分布在红色宽带上, 有两个以跟“红苕”兼用的方式出现在重庆。值得注意的是, “苕”和“薯”虽然比邻分布, 但“苕”的密集分布区并不一定总有“薯”的密集分布区伴随, 如黔东、湘西、湘北。

面对图 7 这样的方言地理景观, 得出以下两点推论是很自然的: 1) “苕”、“薯”只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读音; 2) “苕”类词形的扩散方式是以单音节的“苕”为基础, 向西和向北扩散, 并陆续复音化为“红苕”。越往西, 复音化的力量越大。2) 实际上否定了“苕”类词形由西向东楔入湘鄂皖的可能性, 因为以双音词“红苕”为基础, 向东扩散并衍生为“苕”是很不自然的。上文已指出“苕”的密集分布区并不一定总有“薯”的密集分布区伴随, 因此“红苕”跟“薯”接触变为“苕”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

5. 余论

5.1. 关于“番—”、“胡—”类词形

对外来的事物, 汉语往往在命名时加上“洋”、“番”、“胡”、“西”等字眼儿, 例如“洋葱”、“番茄”、“胡萝卜”、“西芹”等。跟番薯有关的主要是“番”字, 但河南开封用“胡”字(红薯)。

根据 LV015, 可绘制出番薯“番—”、“胡—”

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图(图 8)。其中“番薯”包括表 2 的 A2、A9、B4、B6、B9、E5(3)，“番芋”包括表 2 的 C6、C8、C11、C12，“番葛”包括表 2 的 E5(1)，“胡薯”即表 2 的 A10。

从图 8 可见，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通行的词形主要是“番薯”。这两个省份正是明代最早引进番薯的地方。这两省自古就有指称薯蕷的单音词“薯”(薯)，引进番薯后加上“番”字就可以在名称上把薯蕷和番薯很好地区分开来。“番薯”的说法也扩散到台湾、浙江、赣南、赣东北、海南、桂东。赣西还出现了跟赣南相连的一条南北扩散走廊。重庆、湘西、鄂西的少数方言也使用“番薯”。

根据图 7，指称番薯的单音词“薯”或“苕”主要分布在桂西南及粤北以北的地区，特别是湘鄂赣地区，几乎不见于近海地区(海南儋州应为客赣移民所带去)。这些中部地区用单音词“薯”指称番薯很可能跟这一带不太种植闽粤地区普遍种植的甜薯(一种大薯蕷)有关，传入番薯后就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用“薯”来指称这种外来粮食作物。

5.2. 番薯称谓的去“番”化途径

根据上文 5.1 的讨论，福建、广东把番薯叫做“番

薯”主要原因有两个：1) 这种作物品种是从国外引进的；2) 必须跟原本指称甜薯的单音词“薯”有所区分。当番薯从福建、广东再往其他省份传播的时候，这种作物从国外引进的这一属性就容易自然淡化，从而产生“番薯”的去“番”化现象。去“番”化的途径主要有两大类(标注表 1 的小类)：

A. 直接去掉“番”字；而“薯”(A17, B7, B3, B8, B9, E1)又可以进一步派生出“薯薯”(A19)、“薯一”(A18)、“薯棒”(A20)、“薯脑壳”(A21)、“老薯”(A16)。

B. 把标志外来属性的“番”改成标志番薯的自身属性或来源地的其他字。

- a. 颜色(红：A1, A2, B1-B5, B8；赤：A3；黄：A4；白：A5)
- b. 味觉(甘：A6, D5；甜：A7；糖：A8)
- c. 外形(萝卜：A14)
- d. 生长特点(根：A12) 生长环境(山：A15)
- e. 来源地(京：A11)

当然，也有方言对“番薯”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既换修饰成分(番)，也换中心成分(薯)，例如“甘萝卜”(E3)、“山芋”(C7, C3, C5, C8-C10, C13)。按照前文 4.3.2. 2) 的讨论，“山薯”并非“番薯”直接去“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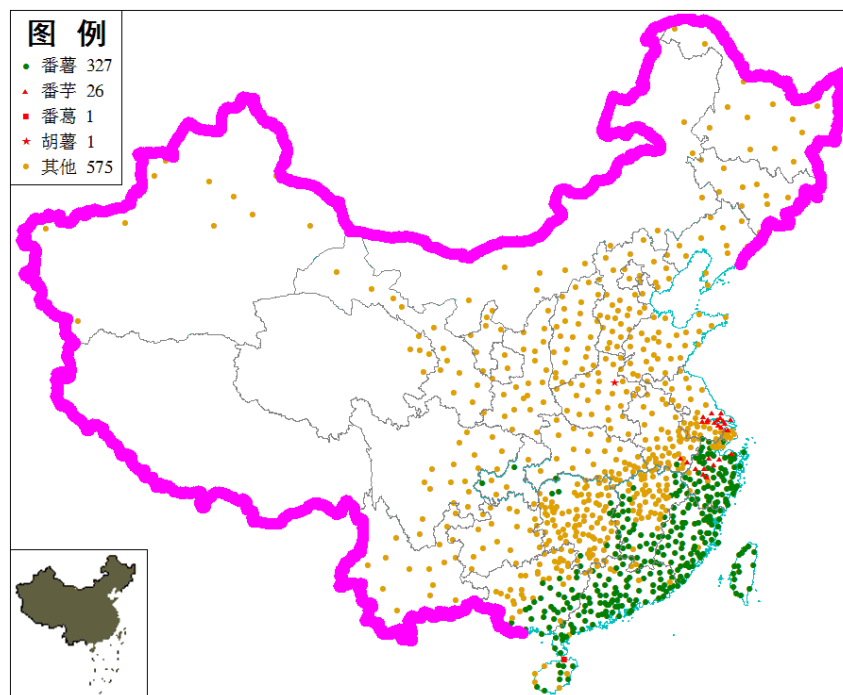


Figure 8.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word forms with “fan” and “hu”
图 8. “番—”、“胡—”类词形的地理分布

化的结果，而是“番薯”和“山芋”两种词形接触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番”化的词形中，以颜色为区别属性的词形最为常见，其中又以“红—”类词形最占优势，如图9所示(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以颜色词形优先归类)。

从图9可以看出，除了滨海省份及东三省很少采用颜色词形以外，其他地区几乎都是颜色词形的天下，其中使用“红—”类词形的方言几近全部930个方言点的1/3。大体上颜色词形和非颜色词形构成了一种东西对立的地理格局。西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东部以滨海省份(天津、河北除外)为核心。颜色词形中，“红”、“赤”只是用字不同。“红薯”占据着颜色词形的绝大部分地盘，“白—”、“黄—”则只是在颜色词形分布区的外围呈局部性的连续分布或散点分布。苏皖西北部出现了“红芋”和“白芋”的局部性连续分布区，“红芋”(C1)在西侧，“白芋”(C4, C5)或“红芋~白芋”(C2)在东侧。前文4.3.2.4)已指出“红芋”是“红薯”和“山芋”接触所产生的混合词形。

“白芋”是方言创新还是来源于“山芋”或“红芋”跟普通话“白薯”的混合，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从图8和图9可以相当直观地看到，汉语方言指称番薯的词形，最主要的就是“番薯”和“红薯”两种。

5.3. 关于“甘—”、“甜—”、“糖—”类词形

上文已指出，把修饰成分换成表示味觉属性的字是“番薯”去“番”化的途径之一。LV015涉及到的用字有“甘”(A6, D5, E3)、“甜”(A7)、“糖”(A8)，具体词形和地理分布如图10所示。

从图10可见，“甘/甜/糖—”类词形的方言点数非常之少，还不足930个方言点的1%。其中“甜薯”(广西陆川县乌石镇沙井村、海南琼海市嘉积镇温泉益群村)、“糖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甘萝卜”(贵州正安县)如果所指不错(番薯)，属于方言创新是没有疑义的，而“甘薯”则需要稍加讨论。

说“甘薯”的方言点非常少，总共只有3个方言点，它们分别是：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大园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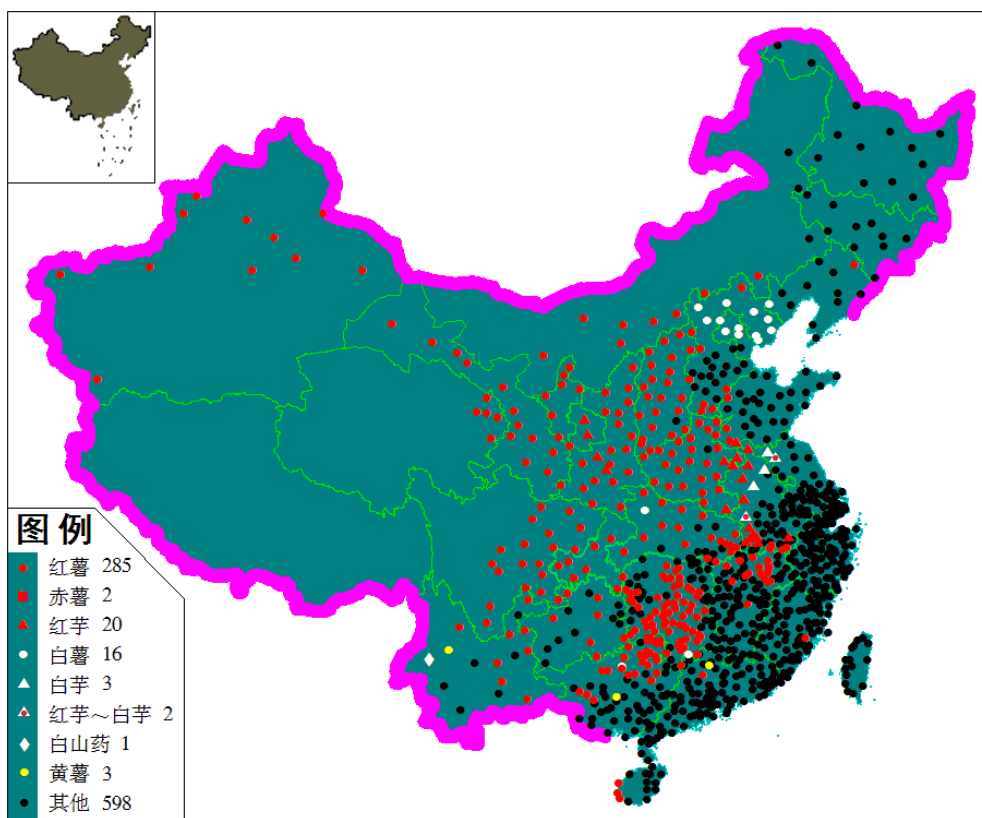


Figure 9.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anshu*'s word forms with colors
图9. 番薯颜色词形的地理分布



Figure 10. The word forms with “gan/tian/tang”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图 10. “甘/甜/糖”类词形及其地理分布

山西长子县丹朱镇下霍村；河北徐水县漕河镇米家营村。其中徐水番薯也说“山药”，属于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据徐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83]，该县“甘薯种植有百余年历史”，卷廿二“方言”所记的说法为“色药”[sai²¹⁴ iau⁴¹]。“色药”即“山药”。因此我们推断徐水的“甘薯”大概是受共同语影响产生的转文说法。长子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即丹朱镇，下霍村在丹朱镇的东南部。据长子县志编纂委员会(1998)^[84]种植业“薯类”部分的介绍，20世纪50年代，该县南常、南陈等地从河南、山东引进红薯种植成功，后逐年推广到全县。可见长子县种植番薯是很晚的事情，而其引种地是河南和山东。河南全省通行“红薯”的说法，山东全省通行“地瓜”的说法，但鲁西情况比较复杂，说“芋头”、“红薯”、“红芋”的方言都有。侯精一、温端政(1993)^[85]和高炯(1995)^[86]所记长子县番薯的说法均为“红薯”[xuŋ⁴¹ su²¹⁴] (高炯将上声处理为²¹⁴)。因此我们认为 LV015 所记的“甘薯”性质跟徐水相同，大概是受共同语影响产生的转文说法。下霍或许跟城关一样，也说“红薯”，属于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至于陵水，所记的“甘薯”也许并

非指番薯。虽然目前我们尚未查到有关陵水番薯说法的方言语料，不过乾隆五十七年(1792)《陵水县志》卷一“地舆志·物产”有如下记载：

芋有二种。在坡者曰面芋，曰东芋，曰鸡母芋。在水者曰水黎芋，银芋。苗茎莹白，与叶皆可生啖。

甘薯叶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瓠者。皮紫肉白，可疗饥，亦以救荒。东坡《志林》云，海南以薯米为粮，几米之十六。

薯蕷即山药。

番薯种来南夷，以蔓埋地即生。有红、白二种。或以酿酒。

以上的记载可以说明陵水的“甘薯”可能是一种薯蕷，并非番薯。换言之，番薯在陵水可能仍叫“番薯”。陵水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7)^[87]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

番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陵水县志》记载：番薯种来自南夷(东南亚地区国家)，以蔓埋地即生，有红、白两种(指红皮、白皮两种)……它是陵水地区的主要干杂粮。解放前，农民以米薯对半或米四薯六

的比例下炊。解放后直至现在,农民仍然餐不离薯。一般为米七薯三或米八薯二作食(逢年过节例外,煮白米干饭),其原因:一是薯味香甜可口;二是节约主粮,便于全年生活安排。如今陵水全县大小饭店、餐厅、乃至中、高级餐馆,均有番薯干饭、稀饭供应。

如果番薯当地俗称“甘薯”,正好就跟共同语里的学名相同,新编县志不用“甘薯”而用“番薯”(简称“薯”),就多少显得有些奇怪。

陵水的“甘薯”是否指番薯尚需再做调查,而徐水、长子的“甘薯”大概是借用共同语的说法(若陵水的“甘薯”果真指番薯,很可能跟徐水、长子属于同一种情况)。因此汉语的番薯学名“甘薯”(可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0^[88]和《现代汉语词典》^[2])实际上是没有方言基础的。这一点跟《现代汉语词典》归为通称的“白薯”、“红薯”完全不同。“白薯”是北京话及其周边方言的通行说法,“红薯”是以中原为核心区域的中西部官话的通行说法,都有很好的方言基础。考虑到番薯传入前汉语文献中出现的“甘薯”实际上指的是薯蕷(参看前文 1.2),我们赞同植物学界以“番薯”作为 sweet potato 汉语学名的实际做法(参看前文 1.1)。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区域类型视角下的汉语方言计量性比较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2009JJD74000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三卷).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 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商务印书馆, 北京, 420, 26, 538, 355.
- [3] 方瑞征, 黄素华 (1979)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四卷第一分册. 科学出版社, 北京, 81, 82, 88.
- [4] 冯德培, 谈家桢, 王鸣岐 (1982) 简明生物学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1444, 266.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生物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1992) 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上海, 1323.
- [6] 铃木史己 (2009) 薯类: 马铃薯和甘薯. In: 岩田礼, Ed.,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白帝社, 东京, 154-161.
- [7]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5) 汉语方言词汇. 第 2 版, 语文出版社, 北京.
- [8]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8) 汉语方音字汇. 第 2 版重排本, 语文出版社, 北京.
- [9] 丁颖 (1929) 作物名实考(九). 农声, 123, 5-10.
- [10] 丁颖, 戚经文 (1948) 中国之甘薯. 中华农学会报, 186, 23-33.
- [11] 吴德邻 (1958) 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南方草木状. 植物学报, 1, 27-38.
- [12] 胡锡文 (1958) 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 In: 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 中华书局, 北京, 21-32.
- [13] 吴德铎 (1960) 甘薯的故事. 科学, 2, 120-127.
- [14] 吴德铎 (1961) 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 文物, 8, 60-61.
- [15] 夏鼎 (1961) 略谈番薯和薯蕷. 文物, 8, 58-59.
- [16] 项梦冰 (2014) “甘薯”及其他. In: 李小凡, 项梦冰, Eds., 承泽堂方言论丛, 语文出版社, 北京.
- [17] 陈树平 (1980) 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3, 187-204.
- [18] 梁家勉, 戚经文 (1980) 番薯引种考. 华南农学院学报, 3, 74-79.
- [19] 杨宝霖 (1982) 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 农业考古, 2, 79-83.
- [20] 公宗鉴 (1982) 对甘薯的再认识. 农业考古, 1, 205-218.
- [21] 何炳棣 (1979) 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世界农业, 4-6, 34-41, 21-31, 25-31.
- [22] 曹树基 (1988) 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 中国经济史研究, 4, 62-66, 74.
- [23] 韩茂莉 (2012)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中册 558-561.
- [24] Yen, D.E. (1974) The sweet potato and Oceania: An essay in ethnobotany. In: Bernice, E., Ed., Bishop Museum Bulletin 236, Bishop Museum Press, Honolulu.
- [25] Hays, T.E. (1979) Review: The sweet potato and Oceania: An essay in Ethnobotany by D. E. Ye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81, 697-698.
- [26] 罗文彬 (2006) 甘薯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学位论文, 福建农林大学, 福州, 5.
- [27] 张箭 (2012) 甘薯的世界传播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9-05 (A05).
- [28] Dixon, R.B. (1932) The problem of the sweet potato in Polyne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4, 40-66.
- [29] 郭松义 (1986) 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In: 清史论丛, 第七辑, 中华书局, 北京, 80-110.
- [30] 宋军令 (2007) 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河南大学, 开封, 46, 39.
- [31] 曹培基 (1997) 客家方言字典. 岩新出内部书刊第 066 号, 龙岩.
- [32] 陈章太, 李行健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语文出版社, 北京, 四 3502, 3500.
- [33]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 (1986-1990) 汉语大字典(八册). 湖北辞书出版社, 四川辞书出版社, 武汉, 成都.
- [34] 石声汉 (1957-1958/2009) 《齐民要术》今释(四册/二册). 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 北京, 四 749/下 1047.
- [35] 明生荣 (2007) 毕节方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 [36] 刘兴策 (1994) 宜昌方言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武汉.
- [37] 谢留文, 沈明 (2008) 黟县农村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 [38]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9) 紫阳县志. 三秦出版社, 西安, 733.
- [39]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 安徽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北京, 498.
- [40] 赵日新 (2003) 绩溪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 79.
- [41] 汪平 (1994) 贵阳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 204, 305, 306, 111, 149.
- [42] 贵州省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北京, 145.
- [43] 杨适 (1994) 贵阳方言. 黔新出(94)内字第 1-014 号, 37, 贵阳.
- [44] 孟庆惠 (2005) 徽州方言. 安徽人民出版社, 合肥, 87, 183.

- [45] 李冬香 (2007) 岳阳柏祥方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 112.
- [46] 张双庆, 李如龙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厦门, 235.
- [47] 朱道明 (2009) 平江方言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武汉, 146.
- [48] 李永明 (1959) 潮州方言. 中华书局, 北京, 236.
- [49] 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 潮州市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1786.
- [50] 陈晓锦 (2003) 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55.
- [51] 陈晓锦 (2010) 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 255.
- [52] 林伦伦 (1991) 汕头方言词汇(一). *方言*, 2, 153-160.
- [53] 林伦伦 (1991) 澄海方言研究. 汕头大学出版社, 汕头, 171.
- [54] 蔡俊明 (1976) 潮语词典. 周法高(发行), 万有图书公司(经销), 香港, 79, 80.
- [55] 林伦伦, 林春雨 (2007) 广东南澳岛方言语音词汇研究. 中华书局, 北京, 423.
- [56] 周芸 (2007) 句容方言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大学, 南宁, 104.
- [57]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 (1960)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688.
- [58] 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8) 高淳县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 798.
- [59]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 356.
- [60] 秋谷裕幸 (2005) 浙南的闽东区方言.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台北, 217.
- [61] 杭州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组 (1959) 温岭方言. *杭州大学学报*, 3, 151-205.
- [62] 温岭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2) 温岭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 844.
- [63] 阮咏梅 (2012) 浙江温岭方言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苏州, 141.
- [64]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 234.
- [65] 陈冬生 (1991) 甘薯在山东传播种植史略. *农业考古*, 1, 219-222.
- [66] 葛剑雄, 曹树基, 吴松弟 (1993) 简明中国移民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 449-454, 474-482.
- [67] 路遇 (1987) 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
- [68] 许宝华, 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北京, 一 350-351, 一 355, 三 3156.
- [69] Matthews, P.H. (2000)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 40.
- [70] 曹玲 (2003) 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35-36.
- [71] 郑南 (2010) 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 杭州, 76-77.
- [72] 储泽祥 (2009) 岳西方言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武汉, 77, 78, 26.
- [73] 丰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9) 丰城县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679.
- [74] 刘丽丽 (2007) 休宁(溪口)方言语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44, 52.
- [75] 钱惠英 (1997) 屯溪话音档.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17.
- [76] 李行健 (1995) 河北方言词汇编. 商务印书馆, 北京, 328.
- [77] 马毛朋 (2003) 陕西渭南方言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 49.
- [78] 陈安子 (2011) 河南南阳方言词汇初探. *大众文艺*, 11, 125-126.
- [79] 张启焕, 陈天福, 程仪 (1993) 河南方言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郑州, 371.
- [80] 陈汝立, 周磊, 王燕 (1990) 新疆汉语方言辞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
- [81] 周磊 (1996) 乌鲁木齐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 345.
- [82] 鲁木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0) 鲁木齐县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 192-195.
- [83] 徐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徐水县志. 新华出版社, 北京, 219, 719.
- [84] 长子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8) 长子县志. 海潮出版社, 北京, 151.
- [85] 侯精一, 温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太原, 223.
- [86] 高炯 (1995) 长子方言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太原, 42.
- [87] 陵水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7) 陵水县志. 方志出版社, 北京, 346.
- [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粮食作物名词术语(NY/T 1961-2010).